

# 世變與玩物

## ——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尚

李惠儀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

### 一、緒言

鑑賞家與收藏家在晚明文人文化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說是囊括了那個時代的種種矛盾與關懷。今試舉數端言之：晚明有關社會等第、雅俗分野、公私界定等問題的討論，及至標新立異與恪守典範，重情尚真與遵循秩序等二端之分合，均可於玩物文化中察見端倪<sup>1</sup>。由此可見，從易代之後有關鑑賞與收藏的討論，可推知晚明精神面貌在清初的持續與轉化，及清初文人對晚明生命情調的追懷與反思。

晚明有關鑑賞與收藏的寫作，可分為二類。其一是以客觀態度評定書畫珍玩的真偽與價值，以及家居日用諸物的雅俗與宜忌。這些著作通常以經、史、譜、錄、箋、志等字眼標題，內容主要是「指南」式的分類、品題與論述，故語調多帶一種不容異議的權威性<sup>2</sup>。有趣的是，在此類譜錄的序跋中，對雅俗等第的客觀述說往往摻雜了風流自賞與留連光景。換言之，個人志趣的表現糾合了士人集團特性的界定。從另一角度看，玩物讓士人游移於仕隱之間，並調和了自我對團體的參與與疏離。其二是描述人與物之關係的詩文，尤其重要的是後世歸類為

---

<sup>1</sup> 參看拙作：“The Collector, the Connoisseur, and Late-Ming Sensibility,” *T'oung Pao* 通報, Vol. LXXXI (1995): 269-302。

<sup>2</sup> Craig Clunas 對這類文字有精微的論述，說詳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小品」的文字。此類「性情文字」所關注的，不再是客觀等第與分類，而是主觀地抒發對物情物理的感悟。其中筆調往往自標新異，肆情任氣，間亦有把物極端「人化」，使之成為情深思苦的對象。於是人與物的遇合，興會淋漓，帶濃厚的傳奇性。物的價值，有時候脫離了市場價值，甚或與其社會、道德、文化等層面的意義也不盡相符。物主或鑑賞家的愛憎喜惡成了價值的源頭，其所體驗鍾情之物，也許是奇異特殊，亦可以是照常理看來為凡庸或有缺陷之物<sup>3</sup>。簡言之，此等述說的重點是物以人貴，以物抒情，通過物來表達自我的奇思、逸興與深情。上述兩種書寫所代表的生命情調，又超過了談物的範疇。舉例說，談論女性風貌的文字，尤其是品妓箋之屬，即以女子作為「物」來品評。記游文章表現的獵奇心態，或可看為品鑑山水。又晚明好言情，而對一往情深的謳歌，竟又交織了自喜、自賞與自遠——這可說是把自我的情思變為鑑賞的對象。

本文擬探討晚明談物的論述在清初的轉化。文人通過玩物、體物、觀物之「自我建構」，在易代之際融入興亡之感與歷史記憶，是以第一節先從前朝遺物談起。設若回憶體現物之時間性，在調和自我對團體的參予與疏離此命題上，談物實界定一種文化空間，呈現其社會效用。在清初的政治氛圍，這是遺民相濡以沫之情懷，亦往往是遺民與清臣交往的線索之一，而明清之際士人進退出處的抉擇，又經常可從其談物賞鑒品第的語彙中察見端倪，所以第二節論及玩物在不同的文人集團所衍生的多層聯繫。論者以為晚明談物有執著的私人象徵，即提升個

<sup>3</sup> 如徐渭(1521-1593)取破膽瓶縣其書齋中，並作〈破膽磬銘并序〉，隱然自喻。序云瓶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膽瓶的價值不在自身而在破於冰之刹那發出的佳音：這「音樂」是藝術境界，亦是道德境界，蓋案《說文》、〈禹貢〉，「泗濱浮磬」，而擊磬（樂石）而生之音，是禮樂之樂。若以此自況，則減裂亦是創造，眾人皆欲殺之際，正是對美善追求昇華之時。〔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冊，卷22，頁592-593。他如陸樹聲(1509-1605)鋤出埋於土的枯木，洗濯疏剔後深賞其撐突奇態，置於几案視為奇物，並引同人賞識（參〈土槎記〉）。又陸嗜硯，自號十硯主人，卻自許與世俗品硯迥別，以為「物無定論，其輕重一出士人之喙」，「如余之嗜硯，不移於珍玩珠品，則硯之託於余而見嗜也，安知不因以為重乎」，陸樹聲不能亦不必隨俗追慕世所謂佳品。既然物論因人而定，他個人的癖好即可以成為其所珍愛之硯的價值源頭，參〔明〕陸樹聲：〈硯室記〉，收入施蟄存編：《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頁18-19。《紅樓夢》談物，如三十一回寶玉以撕扇為愛物，認為物理物用乃主觀架構，即與此一脈相承：「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聲響，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第1冊，第31回，頁328。

人愛憎使之成爲價值來源。這觀點在清初與政治糾纏以後，私人象徵遂變成政治抗爭或是與政體疏離的暗喻。然而玩物的政治寓意可濃可淡，「風流遺民」在文酒社集中托物寄興，是別有深心的鬱勃憤懣，還是「雖不得志，亦且快意」<sup>4</sup>的放浪？此又牽涉清初對明末文人文化任性恣情的反思。第三、第四節所討論的，便是風雅與氣節的關係，藝術境界與道德境界的相反相成，及以祁彪佳所建之寓山及冒襄營構之水繪園爲例證的「審美空間」所代表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 二、前朝遺物

晚明談物的審美風尚，在清初如何轉化？在這個天崩地解的時代，何爲「可玩之物」，玩物又有什麼文化意義？茲以冷士帽（1628-1710）七古〈文太史椅爲姜仲子賦〉爲緣起：

憶昔明當嘉靖時，四海平寧無亂離。衡山名德重天下，揮毫對客常于斯。衡山既沒存此椅，付與隆池門下子。隆池奄忽此椅存，復歸故物衡山孫。衡山之孫爲相國，坐此謀謨補袞職。吁咄嗟，誰知相公沒後成永嘉，國難崩奔亂似麻。門閥一時漂沒盡，此椅流入堯峰家。堯峰文章天下著，置此堯峰讀書處。起居不或暫相離，把酒賦詩常此據。一朝謝忝作修文，堯峰之子持贈君。追惟想像前朝物，異代興亡安可云。此椅雖微百餘載，兵火身經幾更改。世間無事不滄桑，此物依然尚猶在。嗟君之家向來亦是飄零後，對此能無不懷舊。椅乎椅乎，倘君傲然擁書萬卷坐其旁，能令白屋生輝光。而今雖伴烏皮几，他日曾陪綠野堂。避世若非徐孺榻，逃時端是管寧牀。從茲千頃雲樓上，高對南窓注老莊。<sup>5</sup>

冷士帽，江南丹徒人。明諸生，可能曾參予抗清義軍<sup>6</sup>。據《丹徒縣志》，冷氏

<sup>4</sup> [清]陳維崧〈與余澹心〉：「姑蘇三月，花飛草長。平樂之酒十千，當壚之姬三五，如聖野如須輩，慨焉疇昔。古人云：雖不得志，亦且快意。僕豈須臾忘此者哉。」見[明]余懷：《余澹心集》，《余懷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福建叢書》，第3輯），第1冊，頁536。葉襄（聖野）與姜垓（如須）（1614-1653）是志節昭著的遺民，但寄慨逸樂，難免模稜遊移之嫌。

<sup>5</sup> [清]冷士帽：《江冷閣詩集》，《江冷閣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6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3，頁19a-20b。

<sup>6</sup> [清]楊賓《晞髮堂詩集·亡友詩》於士帽云：「冷氏舉義旗，全家著忠烈。」抗清死節者爲冷士帽兄（說見下），但云「全家著忠烈」，似乎冷士帽亦與其事。參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上冊，卷1，頁23。

「蓑衣藟笠，竹杖芒鞋。晦明寒暑不易。或怪之，曰：吾戴藟笠，痛勝國之天不復見。著芒鞋，痛勝國之地不復履。」<sup>7</sup>據其友黃中堅〈秋江散人小傳〉，士崙兄曦曾從史可法和解四鎮，後又為高傑參將，高傑死兵潰後，曦糾合餘眾起義，兵敗被執不屈死，親屬僅免。「由此家破，先生感家國之變，遂服古衣冠而隱。鄉黨苦禁之，不得已變服。然終身未嘗著赤纓」<sup>8</sup>。入清絕意進取，賣文課生徒自給。冷士崙與張自烈(1597-1673)、魏禧(1624-1681)、宗元豫、姜實節(即仲子，姜垞子，1647-1709)、文點(文震孟孫，1633-1704)等遺民之交誼，見於集中酬唱<sup>9</sup>。

冷詩以文徵明(1470-1559)的椅子起興<sup>10</sup>。椅子歷盡滄桑，見證了吳地文化家族的興衰。詩人想像海內尚稱晏安的嘉靖年間(1522-1566)，以書畫名世並亦能詩的文徵明(號衡山)坐在椅上「揮毫對客」。椅子聯繫文物典則：在明末清初文人想像中，沈周(1427-1509)、文徵明、祝允明(1460-1526)、唐寅(1470-1524)等人代表吳中風雅的盛世，而喪亂之後，興會難再<sup>11</sup>。文徵明卒後，椅子付予門人彭年(隆池)<sup>12</sup>，彭歿而椅復歸文徵明曾孫文震孟(1574-1636)，成為他憂勤國事的所在。震孟是明季文氏家族政聲最著者，一六二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後，因耿介直諫而宦途蹭蹬。天啓(1621-1627)年間魏忠賢擅權，迫害東林

<sup>7</sup> 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卷1，頁23。

<sup>8</sup> [清]黃中堅：〈秋江散人小傳〉，《蓄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7冊影印清康熙五十年棟華堂刻五十三年增修本），卷9，頁26b。冷士崙：《江冷閣文集·續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6冊影印清康熙刻本）有〈黃蓄齋先生文集序〉（卷下，頁19a-20b）。有關衣冠與遺民生活方式，參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08-317。

<sup>9</sup> 參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卷1，頁22-24；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1冊，頁787-791；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上冊，頁275-276；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上冊，頁159-162。

<sup>10</sup> 《明史》卷二八七有文徵明傳。

<sup>11</sup> 如吳偉業在〈京江送遠圖并序〉有句云：「吾吳儒雅傾當代，石田（沈周）既沒風流在。待詔（文徵明）聲華晚更道，枝山（祝允明）放達長無害。歲月悠悠習俗非，江鄉禮數歸時態。縱有丹青老輩存，故家興會知難再。」[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上冊，卷10，頁273。「京江送遠圖」乃沈周為吳偉業高祖吳愈作。圖成於一四九二年，祝允明為之序。文徵明學畫於沈周，又為吳愈婿，故詩及之。

<sup>12</sup> 見[明]王世貞：〈彭孔嘉詩集序〉，收入[明]彭年：《隆池山樵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6冊影印明刻本），據王世貞(1526-1590)序，彭雖布衣，卻以詩畫得名。

黨人，震孟疏請勤學勤政，語侵魏忠賢，幾被杖。崇禎(1628-1644)時以侍讀及日講官之職分屢屢進言，因忤權臣溫體仁等。一六三五年明思宗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但三月而斥，未得其用，貶黜次年即辭世<sup>13</sup>。於此椅子象徵力挽狂瀾的政治抱負。震孟欲藉諫諍匡救時艱(所謂「補袞職」<sup>14</sup>)的理想不能實現，不單是他個人的挫折，亦是明王朝的喪鐘：明思宗猜忌寡恩，多疑善變，有志之士旋擢旋黜，乃禍敗根由之一。而當時文震孟上疏陳致亂之由，指斥廟堂猜疑，黨人蒙蔽，及兵將無紀律驅民為賊等情狀，正是明朝覆亡的徵兆。

震孟死不數載而國破家敗，椅子流入汪琬(堯峰)(1624-1691, 1655年進士)家：「誰知相公沒後成永嘉，國難崩奔亂似麻。門閥一時漂沒盡，此椅流入堯峰家。」永嘉之亂(311)，劉曜石勒入洛陽，晉懷帝被擄，五年後劉曜入長安，愍帝被擄，晉室南渡。此處以五胡亂華，神州陸沉，懷、愍蒙塵指明社之屋。「漂沒」「流入」等詞引起洪流巨變的想像，椅子易手，並非再如文徵明後人贈彭年，或彭年後人贈文震孟一般從容授受，而是閥閱高門破敗後無可奈何的散亡。我們已無由得知汪琬如何獲得這椅子。汪琬曾為文震孟立傳，並在篇終述說訪其已然易主之故居：「因抵其讀書之所，所謂青瑤嶼者。俛清沼，攀修柳，慨然久之。適大風颯颯起林木間，輒想像公掀髯抵手，痛詬逆黨時也。」<sup>15</sup>心儀若許，可想見他據椅遺情想像，顧望懷愁的意興。汪琬作此傳，是按文震孟行狀及其子文秉(1609-1669)所撰《烈皇小識》<sup>16</sup>，傳付秉之子點，「俾後生有考焉」(當然也有可能作傳是受文點請託。)汪琬亡故，其子又將椅轉贈姜埰(1607-1673, 1631年進士)之子姜實節<sup>17</sup>。冷詩即為實節作。

<sup>13</sup> 參看〔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冊，卷251〈文震孟傳〉。

<sup>14</sup> 《詩經·仲山甫》：「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正義》：「袞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袞，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為乘輿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諍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8之3，頁15b-16a。

<sup>15</sup> 〔清〕汪琬：〈文文肅公傳〉，《堯峰文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5冊)，卷35，頁13b-14a。

<sup>16</sup> 汪琬文作《愍帝小識》。有關文秉與明清之際史乘及其《烈皇小識》與《甲乙事案》，參看 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8), pp. 194-195, p. 226。

<sup>17</sup> 有關姜埰、姜垓兄弟事跡及其清初德望，參見謝正光：〈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山東萊陽姜氏行誼考論〉，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

文家與汪家爲吳中大族，淵源至深，而易代之際，升沉各異。汪琬入仕新朝，依然顯貴。文家敗落，文震孟次子文乘抗節殉難，震孟弟震亨(1584-1645)絕食死於蘇州。明亡後震孟長子秉隱居，杜門著書終其身。文秉子文點依墓田以居，素無恆產，賣書畫自給<sup>18</sup>。震亨子文果(文園公，輪庵和尚)滄桑後披緇逃禪，文果與文點均爲著名遺民畫家<sup>19</sup>。姜埰原籍山東萊陽，明末因上疏忤旨廷杖繫獄幾死，謫戍宣州衛，途中聞北京陷，流寓真州，後轉徙蘇州。姜埰及其弟姜垓(1614-1653)並子姪均退隱不仕，姜氏亦與文氏及汪氏過從甚密。姜埰曾爲文秉所撰《先撥志始》作序<sup>20</sup>。姜埰子安節、實節所撰〈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云：「庚子年(1660)。五十四歲。是年卜居蘇州罇諸里。荒園數畝，舊屬文相國湛持(文震孟)別業。兵燹之餘，稍加修葺。署其廬曰東萊草堂，又曰敬亭山房。」<sup>21</sup>然則前述汪琬訪文氏故居，其新主人可能已是姜氏。文氏別業本名「葯圃」，又名「清瑤嶼」。姜埰改名爲「頤圃」，後復改爲「藝圃」<sup>22</sup>。姜埰以敬亭榜其山房，又自號敬亭山人，宣州老兵，臨終詩云「死葬我於敬亭之崎」，是藉此表明始終盡忠前朝，因爲宣州是「君恩免死之地」<sup>23</sup>。據謝正光考證，文

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291-343。

- <sup>18</sup> 查慎行(1650-1727)所謂「世家文物傳詩畫，相國衣冠傍墓田」即指此。見〔清〕查慎行：〈過文與也竹塢草廬〉，《敬業堂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6冊)，卷18，頁12b；參看〔清〕朱彝尊：〈處士文君墓誌銘〉，《曝書亭集》(上海：世界書局，1937年)，第2冊，卷74，頁854-856。一六二二年彝尊曾祖朱國祚充會試總裁，文震孟試禮部，名在弟子之列，兩家締世好。文點與朱彝尊交誼甚篤。
- <sup>19</sup> 參看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贈文園公〉，《吳梅村全集》，上冊，卷11，頁302-303；〔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等整理：〈題文與也爲梁日緝畫江村讀書圖二首〉，《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冊，卷4，頁608-609；汪琬：〈贈文與也三首〉，《堯峰文鈔》，卷41，頁18b-19a。
- <sup>20</sup> 〔明〕姜埰：〈先撥志始序〉，《敬亭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3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6，頁3a-4a。
- <sup>21</sup> 〔清〕姜安節、姜實節編訂：〈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收入《敬亭集》，年譜續編頁1a。姜埰自著年譜(亦見《敬亭集》)至五十三歲而輟。
- <sup>22</sup> 陳維崧《藝圃詩序》原註：「藝圃者，姜如農先生仲子學在所居也。其先爲文文肅公清瑤嶼。」(《陳檢討四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2冊〕，卷5，頁10b)按藝圃又名窩園，參看〔清〕施閏章著，吳家駒點校：〈題故給諫姜如農先生吳門窩園〉，《施閏章詩集》(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724。題下自註云：「文文肅公舊業，姜署曰敬亭山房，以前朝謫戍宣州故。」按敬亭山在宣州。
- <sup>23</sup>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校點：〈敬亭山房記〉、〈明遺臣姜公傳〉，《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中冊，頁734-735、854-858。姜埰：〈易簣歌〉，《敬亭集》，卷2，頁25a。

天祥乃姜埰引以自況的忠君典範，震孟爲文天祥後裔<sup>24</sup>，而其因耿介直諫忤權臣遭貶黜的命運又與姜埰際遇暗合，故購置其舊園亦是有政治象徵意義的自我表述<sup>25</sup>。汪琬子以文家椅子贈姜實節，除了因爲二人交誼，實緣其家族對文氏深深景慕，或並有「物歸原地」之意。雖然姜埰自撰年譜及其子續編年譜屢云困乏拮据，但易代後姜氏家族似仍甚富裕，所以姜埰才可以營建藝圃<sup>26</sup>。從汪琬、吳綺(1619-1694)、施閏章(1619-1683)、陳維崧(1625-1682)、宋犛(1634-1713)、王士禛(1634-1711)諸人題詠，可以想見藝圃規模<sup>27</sup>。

嚴格說，「文太史椅」並非藝術品，但世變爲之賦予特殊的文化意義。明亡以前，椅子代表了政治關懷與藝術創作的連續性，即如文家累代居官而又以文人畫家輩出名世——在詩人想像中，文徵明畫畫，文震孟治國，都離不開椅子。入清以後，冷士崐描述汪琬據椅把酒賦詩，卻避諱不談他出仕新朝：「堯峰文章天下著，置此堯峰讀書處。起居不或暫相離，把酒賦詩常此據。」作爲前朝遺物，椅子的文化意義掩蓋了或可說是壓抑了新的政治分歧。椅子在文、汪、姜三家族中間輾轉相授受，正說明不同的政治抉擇不足以動搖固有的文化和社會網絡。椅子見證和經歷了禍亂，卻又代表文化的傳承與延續：「此椅雖微百餘載，兵火身經幾更改。世間無事不滄桑，此物依然尚猶在。嗟君之家向來亦是飄零後，對此能無不懷舊。」椅子身經浩劫，但冷士崐期待姜實節以此超越歷史變遷：「椅乎椅乎，倘君傲然擁書萬卷坐其旁，能令白屋生輝光。而今雖伴烏皮几，他日曾陪

<sup>24</sup> 朱彝尊〈處士文君墓誌銘〉：「修文氏族譜，本温州守之訓，謂人立身自有本末，出處自有據依，何必附丞相信公以爲重，故自蘇州分派始。」（《曝書亭集》，第2冊，卷74，頁855）按此則文天祥爲其遠祖。

<sup>25</sup> 謝正光：〈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山東萊陽姜氏行誼考論〉。

<sup>26</sup> 同前註。

<sup>27</sup> [清]吳綺：〈藝圃詩爲學在賦〉，《林蕙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4冊），卷18，頁21b-23b；王士禛著，李毓芙等整理：〈藝圃雜詠十二首爲萊陽姜學在賦〉，《漁洋精華錄集釋》，中冊，卷8，頁1252-1261；汪琬：〈姜氏藝圃記〉、〈藝圃十詠〉、〈思嗜軒詩并序〉、〈藝圃小游僊六首〉、〈藝圃竹枝歌四首〉、〈再題姜氏藝圃〉，《堯峰文鈔》，卷23，頁9b-11a、卷42，頁22a-24a、21a-21b、卷48，頁8a-9b、10b；陳維崧：〈藝圃詩序〉，卷5，頁10b-15a；[清]吳雯：〈藝圃十二詠阮亭先生命作〉，《蓮洋詩鈔》（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四部備要》本），卷1，頁1b-2b；[清]宋犛：〈和藝圃雜詠十二首有序〉，《西陂類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3冊），卷6，頁9a-11b；施閏章：〈題故給諫姜如農先生吳門寓園〉。

綠野堂。避世若非徐孺榻<sup>28</sup>，逃時端是管寧牀<sup>29</sup>。從茲千頃雲樓上<sup>30</sup>，高對南窓注《老》《莊》。」

此詩結句塑造摒棄繁華，遺世物外的高人逸士形象。徐崧《百城煙水》亦謂姜實節「足不入城市」<sup>31</sup>。「不入城」是遺民論述常見的話題，似乎不如是不足彰顯志節。但實節頗事冶遊，不入城不大可信。姜實節雖未應試，卻與當時勝流包括仕清者如汪琬、吳綺等交情甚篤，實節本人亦是有名的風流才子，朱素臣《秦樓月》傳奇即以姜實節及其青樓相知陳素素的悲歡離合為本事。其父姜埰其叔姜垓以志節堅貞為士流所重，但不廢收藏賞鑒的興致，何況前朝遺物引起的流連詠歎兼具歷史記憶。姜垓臨終時把在廟市購得的內庫玉羊轉贈乃兄，《敬亭集》有詩述其事：

咸陽烽火倍堪傷，御府銀鈎宛宛藏。薊北山川豺虎窟，天涯生死鶴鴿行。  
裴楷甲第今荒草（原註：替弟寄書有裴楷治第，即讓兄居之語）<sup>32</sup>，蘇武  
丁年故乳羊。為語兒替好珍惜，吾家傳笏尚盈牀。<sup>33</sup>

姜埰於詩題下自註云：「案頭玉羊一具前朝物也，替弟垓得於廟市。易簣之際，出以貽贈，覽之感賦。」亂餘劫後，典章文物，掃地都休。玉羊不在大內而在姜氏案頭，覽之能無亡國之痛。因玉羊用作鎮紙，所以御府「宸翰」鐵畫銀鈎，宛然在目。更兼緯書傳統，本來就有「亡玉羊」是亡國之徵的說法<sup>34</sup>。「豺虎窟」

<sup>28</sup> 徐穉（字孺子），漢末高士，為陳蕃禮遇舉薦，桓帝徵辟不就。「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6冊，卷53，頁1746。杜甫詩《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卷22，頁1138。

<sup>29</sup> 管寧，亦漢末高士，以克己復禮，廉潔自重存身亂世。見〔晉〕陳壽：《三國志》（上海：中華書局，1960年），《魏書》，卷11，頁354-366。

<sup>30</sup> 冷詩自註：「山齋千頃雲，虎丘仲子山樓處。」見冷士喟：《江冷閣詩集》，卷3，頁20a。

<sup>31</sup> 〔清〕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冊，頁3234，引《畫徵續錄》。

<sup>32</sup> 裴楷之寬厚任率，參看〈裴楷傳〉：「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冊，卷35，頁1048。

<sup>33</sup> 姜埰：《敬亭集》，卷4，頁33b-34a。

<sup>34</sup> 〔漢〕鄭玄註《易緯是類謀》：「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雞失羊亡，臣從恣，主方佯，天下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冊〕，頁9a）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8冊），卷38〈梁任昉求為劉瓛立館啓〉：「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歷遷于干越。」（頁41a）

應是用杜甫〈覽鏡呈柏中丞〉頷聯：「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sup>35</sup>詩大概作於大曆元年(766)杜甫初至夔州時。豺虎犬羊，寫的正是盜侵蕃陷的長安。就姜埰言，京師(蘄北)陷落，「豺虎」凌逼，遂使姜氏兄弟流落天涯，不再萌歸死首丘之想。《詩·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以鵲鴿對豺虎，即謂亂世別無憑藉，唯有靠兄弟患難中濡沫相扶持。姜埰死前數月，曾寄書姜埰曰：「裴楷治第，即讓兄居。杜甫奔峽，每期弟至。近棄梁溪之田，再買剡曲一宅。不煩兄手足之力，而翩翩來矣。」<sup>36</sup>於此可見手足情深。「甲第」、「丁年」一聯脫胎自溫庭筠〈蘇武廟〉名句：「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蘇武歸漢，已是遣使他的漢武帝駕崩以後<sup>37</sup>，而蘇武亦已非昔日出使時壯盛丰儀，即李陵〈答蘇武書〉所謂「丁年奉使，皓首而歸」<sup>38</sup>。

溫庭筠原句撫今追昔的悲懷，在姜埰詩中再下轉語。蓋不僅人之云亡，更兼邦國殄瘁。玉羊是姜埰臨終貽贈，亦是前朝遺物。玉羊引發的聯想，則是象徵去國辭鄉之悲苦的「乳羊」。《漢書》載蘇武奉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sup>39</sup>。羝即牡羊，羝不當產乳，匈奴以不可能之事設譬，示絕其歸望。蘇武在極端困厄中堅持志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sup>40</sup>姜氏兄弟雖因貶謫離亂遠別故鄉山東萊陽，但以吳中文物淵藪比作北地蠻荒，是否引喻不倫？於此姜埰所追捕的，大概是神州陸沉後故國淪為異域的悲哀。清初詩人多有借此題發揮者，如錢謙益(1582-1664)：「促坐不須歌出塞，白龍潭是

<sup>35</sup>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卷18，頁916-917。姜埰寄弟詩有「學詩必學杜工部」句，見姜埰：〈祭三弟文〉，《敬亭集》，卷10，頁12a。

<sup>36</sup> 姜埰：〈祭三弟文〉，卷10，頁12a。

<sup>37</sup> 《漢武故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錯雜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72)甲帳因代指漢武帝。樓臺非甲帳，即謂追求不死之武帝已然物故。

<sup>38</sup> [漢]李陵：〈答蘇武書〉，收入[南朝梁]蕭統編：《昭明文選附攷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41，頁571-574。

<sup>39</sup>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冊，卷54，頁2462-2463。

<sup>40</sup> 同前註，頁2463。

拂雲堆」<sup>41</sup>；顧炎武(1613-1682)：「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嬴」<sup>42</sup>；黃翼聖(1596-1659)：「莫歎錦官遙萬里，只今吾地是他鄉」<sup>43</sup>；方中通(方以智之子)：「休道世間難著足，中原今日總他鄉」<sup>44</sup>；吳兆騫(1631-1684)：「胥臺麋鹿非吾土，江左衣冠異舊遊」<sup>45</sup>。姜埰以「蘇武丁年故乳羊」寫兄弟轉徙流離，吾土竟成他鄉，同一激越悽楚。「爲語兒暫好珍惜，吾家傳笏尚盈牀」，應是化用蘇軾和弟并寄子姪詩：「他年汝曹笏滿牀，中夜起舞踏破甕。」<sup>46</sup>笏滿牀借言官爵祿位昌盛<sup>47</sup>。蘇軾以自嘲緊接厚望——一個只能買一甕的窮人，夜宿甕中，籌算賣甕獲利後可買二甕，自二甕化爲四，自四甕化爲八，倍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sup>48</sup>。「笏滿牀」的期待，無異「踏破甕」的窮漢之癡想，所以蘇詩以睥睨功名作結：「但令文字還昭世，糞土腐餘何足夢。」在姜埰詩中不求功名聞達別具時代意義。盈牀之笏是明朝之笏，姜埰寄望子姪珍惜玉羊，似是希冀他們不執清朝之笏，維持對先朝追念，作世襲遺民。

姜詩云「裴楷甲第今荒草」，但如前所述，此甲第頗具規模。徐崧《百城煙水》亦謂爲「閭門內勝地」<sup>49</sup>。姜實節曾梓藝圃題詠爲《藝圃詩刻》，名畫家

41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霞老累夕置酒彩生先別口占十絕句記事兼訂西山看梅之約〉其二，《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上冊，頁343，詩繫一六五七年。據陳寅恪考證，席間歌妓彩生亦爲有志復明者。陳寅恪著：《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冊，頁1119。錢詩意謂彩生不必歌昭君出塞之曲——在異族統治下，吳中白龍潭已無異塞外拂雲堆。逐臣遷客之悲，已是難以遣懷，不堪再聽昭君出塞之曲。

42 [清]顧炎武撰，王冀民箋校：〈海上四首〉其四，《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上冊，頁70。

43 [清]黃翼聖：〈秋杪同莊宜禪金孝章祖生袁重其家兄奉倩汎虎丘用陽字〉，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卷1，頁71。

44 [清]方中通：〈贈劉鼇石〉，轉引自同前註，卷1，頁130。

45 [清]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贈祁奕喜〉，《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87。詩繫一六五五年。

46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註：〈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東坡詩集註》（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9冊），卷10，頁32a。

47 唐崔琳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冊，卷109，頁4098。

48 王十朋引次公俗說，見蘇軾撰，王十朋註：《東坡詩集註》，卷10，頁32a。

49 [清]徐崧、張大純纂輯，薛正興校點：《百城煙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2〈吳縣〉，頁129-130「思嗜軒」條。思嗜軒在敬亭山房旁，乃姜埰長子安節所築。徐崧並載他本人及施閏章、劉文昭、姜希轍、余思復、紀映鍾、史惟圓、姜安節諸

王翬曾畫藝圃圖<sup>50</sup>。冷士岫詩稱姜實節所居為「白屋」，似乎居無長物。但吳綺說他「多藏而服古」<sup>51</sup>。陳維崧〈藝圃詩序〉原註亦云：「（藝圃）最為吳中勝處，學在讀書其中，旁列古鼎彝及茶鑑酒董諸小物。」<sup>52</sup>當時置諸姜實節案頭者，也許尚有他珍藏的宣德窰青花脂粉箱。此物據說是明大內故物，有關題詠屢見清初詩詞，可考者包括吳綺、汪琬、余懷（1616-1696）、毛奇齡（1623-1716）、陳維崧等人的文集。據汪琬說：「諸君子為此歌，引物連類，多至千餘言。」<sup>53</sup>吳綺亦記當時名士把玩題識的興致：「置以書牀，用等琉璃硯匣。姜子既獨珍之，什襲三君，乃競美以篇章。物兼華實以咸工，詞備抑揚而盡變。」<sup>54</sup>姜實節當初只寶愛此宣窰「質素文青，體堅制妙」<sup>55</sup>，置諸其硯塘側，摩挲把弄，但並不知其為何物。一般商人不能辨認其來歷，後來經老宮監判定始知為故宮所用，故毛奇齡〈宣德窰青花脂粉箱歌為萊陽姜仲子賦〉<sup>56</sup>云：「摩挲日劇但把弄，未審甄人定何用。賈人欲認不辨名，盧女相看宛如夢。連昌宮監老不堪，落花時節來江南。見此忽爾驚嘆息，云是先朝舊承值。」脂粉箱結構特殊，長型中窶，四周有複壁，可能以溫水流注以防脂粉膠結。毛奇齡因此想像脂粉箱為宮殿御溝的縮影，而御溝依稀存宮妃殘留之餘膩：「宛如麗華鬪粧罷，宮溝淺膩縈苑牆。」

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年號（1425-1435年在位）。宣窰脂粉箱變為明初盛世的標記，故汪琬〈宣德窰脂粉箱歌并序〉開篇即云：「景陵踐阼承平中，干戈不用年屢豐。饒州花瓷充供奉，聲賈略與官哥同。」<sup>57</sup>衆作均從脂粉箱的流落致慨明朝敗亡，而托興遙深首推陳維崧〈滿庭芳·詠宣德窰青花脂粉箱為萊陽姜學在賦〉：

龍德殿邊，月華門內，萬枝鳳蠟熒煌。六宮半夜，齊起試新妝。詔賜口脂

人題詠。

<sup>50</sup> 邵忠、李瑾編著：《吳中名賢傳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038。

<sup>51</sup> [清]吳綺：〈姜仲子宣窰脂粉箱題詞〉，《林蕙堂全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4冊），卷10，頁5a。

<sup>52</sup> 陳維崧：《陳檢討四六》，卷5，頁10b。吳綺賦〈藝圃詩四十首〉，姜實節梓而傳之，並屬陳維崧為序。

<sup>53</sup> 汪琬：〈宣德窰脂粉箱歌并序〉，《堯峰文鈔》，卷42，頁21b-22a。

<sup>54</sup> 吳綺：〈姜仲子宣窰脂粉箱題詞〉，卷10，頁5a。

<sup>55</sup> 同前註。

<sup>56</sup> [清]毛奇齡：〈宣德窰青花脂粉箱歌為萊陽姜仲子賦〉，《西河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2冊，卷163，頁2736。

<sup>57</sup> 汪琬：〈宣德窰脂粉箱歌并序〉，卷42，頁21b-22a。

面藥，花枝裊，笑謝君王。燒瓷翠，調鉛貯粉，描畫兩鴛鴦。當初溫室樹，宮中事秘，世上難詳。但銅溝漲膩，流出宮牆。今日天家故物，門攤賣，冷市閑坊。摩挲怯，內人紅袖，慟哭話昭陽。<sup>58</sup>

詞中今昔之比，脫離籠統概括，而藉兩個特定的時刻互見構成。上半追想宣德盛日，六宮佳麗夜起試粧，盈盈笑語，拜謝賞賜，以貯「口脂面藥」的脂粉箱小結君王恩澤<sup>59</sup>。下半描摹明亡後，宮人認出故內遺物，摩挲情怯，慟哭前朝，以脂粉箱的淪落反襯國破家亡。換頭借溫室樹的典故，撮領戀情詩詞慣用的秘密及遠隔的意象，表達故國之思。案《漢書》孔光傳，光周密謹慎，休沐亦絕不言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sup>60</sup>。溫室樹象徵不可知的宮中秘事，惟其不可知，才引人暇思遙想，正如燭光半夜、宮牆隱迷暗示求之不得的追慕。「漲膩」用杜牧〈阿房宮賦〉「渭流漲膩，棄脂水也」抒發亡國之痛。寫脂粉箱由隱密到拋露，從宮中秘藏流落到冷市門攤，空中傳恨，感喟無窮。前朝遺物讓觀者感嘆興亡，重新考察盛衰之契機。

眷懷家國與歷史判斷之間的關係甚為複雜。前述詩詞把宣德追想為明朝承平盛世<sup>61</sup>，但明清詩、文、小說、筆記又好談明宣宗嗜鬪蟋蟀，因求異種勞民傷財，並認為這是王朝衰敗的徵兆。據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記載，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个。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今宣窰蟋蟀益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sup>62</sup>。約一六五四至一六五六期間，吳偉

<sup>58</sup> 陳維崧：《湖海樓詞集》，見錢仲聯選編，陳銘校點：《清八大名家詞集》（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頁160。

<sup>59</sup> 用杜甫〈臘日〉：「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詩意。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卷5，頁316。

<sup>60</sup> 班固：《漢書》，第10冊，卷81〈匡張孔馬傳〉，頁3354。

<sup>61</sup> 有關近代史家對明宣宗的評價，參陳學霖：〈宣德統治時期〉，收入牟復禮(Frederick Mote)、崔維澤(Denis Twitchett)編撰，張書生等譯，謝亮生校：《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314-336；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33-141；Frederick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22-626。

<sup>62</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中冊，卷25，頁625。有關記載，又見吳翌鳳徵引的《明小史》及王世貞《國朝叢記》，詳吳偉業著，吳翌鳳箋注：《吳梅村詩集箋疏》（香港：廣智書局，出版年不詳），頁106。《聊齋》故事〈促織〉，敘宣宗歲征蟋蟀，以致貪官虐吏擾害民間。[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4，頁484-490。

業(1609-1672)在北京的時候，看到友人同年進士孫承澤(1592-1676)收藏的宣宗蟋蟀盆，感賦〈宣宗御用戲金蟋蟀盆歌〉：

宣宗在御昇平初，便殿進覽幽風圖。煖閣才人籠蟋蟀，畫長無事爲歡娛。  
 定州花甕賜湯沐，玉粒瓊漿供飲啄。戲金髹漆隱雙龍，果廠雕盆錦香褥。  
 欣飛著翅逞腰身，玉砌軒髻試一鳴。性不近人須耿介，才堪却敵在慄輕。  
 君王暇豫留深意，棘門霸上皆兒戲。鬪鷄走狗謾成功，今日親觀戰場利。  
 坦穎長身張兩翼，鋸牙植股鬚如戟。漢家十二羽林郎，蟲達封侯功第一。  
 臨淮真龍起風雲，二豪螟蛉張與陳。草間竊伏竟何用，竈下廝養非吾羣。  
 大將中山獨持重，却月城開立不動。兩目相當振臂呼，先聲作勢多操縱。  
 應機變化若有神，僂突彷彿常開平。黃鬚鮮卑見股栗，垂頭折足亡精魂。  
 獨身跳兔追且急，拉折攀翻只一擲，螭螭塞外蠕蠕走，使氣窮搜更深入。  
 當前拔柵賭先登，奪采爭籌爲主人。自分一身甘瓦注，不知重賞用黃金。  
 君王笑謂當如此，楚漢雌雄何足齒。莫嗤超距浪輕生，橫草功名須致死。  
 二百年來無英雄，故宮瓦礫吟秋風。一寸山河鬪蠻觸，五千甲士化沙蟲。  
 灌莽微軀亦何有，捉生誤落兒童手。蟻賊穿墉負敗背，戰骨雖香嗟速朽。  
 涼秋九月長安城，黑鷹指爪愁雙睛。錦鞵玉縵競馳逐，頭鵝宴上爭輸贏。  
 鬪鴨欄空舞馬死，開元萬事堪傷心。秘閣圖書遇兵火，廠盒宣窰賤如土。  
 名都百戲少人傳，貴戚千金向誰賭？樂安孫郎好古癖，別紅填漆收藏得。  
 我來山館見雕盆，蟋蟀秋聲增歎息。嗚呼！漆城蕩蕩空無人，哀螢切切啼  
 王孫。貧士征夫盡流涕，惜哉不遇飛將軍。<sup>63</sup>

這首長詩以沉恨與批判雙管齊下，交織今昔、興衰、真幻等不同的線索。本來宣宗酷好蟋蟀，只能算是玩物亂政，但吳詩開頭時未下鍼砭。相反地，詩人歌頌昇平，用經典中的蟋蟀和名畫中的蟋蟀堂皇地入題：「宣宗在御昇平初，便殿進覽『幽風圖』。煖閣才人籠蟋蟀，畫長無事爲歡娛。」《詩經·幽風·七月》有「蟋蟀在我牀下」之句，是以吳偉業用趙孟頫(1254-1322)「幽風圖」點題。宣宗展玩「幽風圖」，妃嬪籠蟋蟀爲戲，是閑雅，不是荒嬉。寫到蟋蟀的榮寵，才顯出汰奢與本末倒置：「定州花甕賜湯沐，玉粒瓊漿供飲啄。」珍貴的定州瓷既

<sup>63</sup>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冊，頁 61-63。孫與吳均爲崇禎四年進士。對吳偉業詩中物與記憶的關係的論述，參拙作：“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d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99-148。

成蟋蟀封疆的「湯沐之邑」，國事亦隨之變為兒戲了。

貫徹全詩的反諷，藉顛倒蟋蟀勇猛與名將武功，蟋蟀益與歷史戰場，錯綜申述。一連串雙關語，正反比喻，和作為點染襯貼的蟲部字，混淆了人與蟋蟀的界限。而「錯位」又先自宣宗眼中鋪敘：「君王暇豫留深意，棘門霸上皆兒戲。鬪鷄走狗謾成功，今日親觀戰場利。」昔日漢文帝見絳侯周勃軍律嚴明，讚嘆道：「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sup>64</sup>明宣宗劇賞蟋蟀，竟如漢文帝看重周勃。宣宗以蟋蟀為「真將軍」，深為留意，所以才覺得「棘門霸上皆兒戲」，蟲戲與軍政於是輕重顛倒。在宣宗「親觀」的視野中，鬪蟋蟀彷彿重演元末明初的風雲變色，「草莽英雄」亦因之展現雙重語境：「坦頰長身張兩翼，鋸牙植股鬚如戟。漢家十二羽林郎，蟲達封侯功第一。臨淮真龍起風雲，二豪螟蛉張與陳。草間竊伏竟何用，竈下廝養非吾羣。」「張兩翼」是戰陣亦是蟲態，「鬚如戟」、「羽林郎」、「蟲達」等造語都是亦人亦蟲<sup>65</sup>。當時逐鹿中原的張士誠與陳友諒，面對「真龍」朱元璋，只能算是草間偷活的「螟蛉」。但在詩人筆下，宣宗眼中，不僅敗者為「蟲」，蟋蟀善鬪更讓人聯想到開國功臣徐達、常遇春等人北逐元帝的彪炳戰功。徐達助朱元璋起兵，軍功至高，死後追封中山王。「大將中山獨持重」二句即以蟋蟀比作堅決守城的徐達。繼則以怒目振臂，操縱騰躍之蟋蟀比美先聲奪人、機變善戰的常遇春。按常遇春與徐達同領兵，亦以驍勇聞，死後追封開平王<sup>66</sup>，因有「應機變化若有神，傑突彷彿常開平」等句。「黃鬚鮮卑」，語出《世說·假譎》，此指元順帝。元帝逃奔塞外，無異垂頭折足、亡精喪魄的鬪敗蟋蟀。比物連類，似乎是妝點提昇宣宗的癖好，但反諷自不待言。

宣宗觀鬪蟋蟀而追想開國的光榮戰績，是以蟲擬人，隨著明朝的衰亡，戰敗的將兵死傷累累，直可以人擬蟲。「二百年來無英雄，故宮瓦礫吟秋風。一寸山河鬪蠻觸，五千甲士化沙蟲。灌莽微軀亦何有，捉生誤落兒童手。蟻賊穿墉負敗齒，戰骨雖香嗟速朽」。在《莊子》寓言中，蝸右角的蠻氏與蝸左角的觸氏爭地而戰，伏屍數萬。據《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三軍之士，一朝盡

<sup>64</sup>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6冊，卷57，頁2074-2075。

<sup>65</sup> 《史記》：「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同前註，第8冊，卷81，頁2450）羽林騎，漢武帝所置，參班固：《漢書》，第3冊，卷19上，頁727。楚漢之際，蟲達因破項羽軍陳下封侯，參《史記》，卷18，頁911。

<sup>66</sup> 參張廷玉等：《明史》，第12冊，卷125，頁3723-3730。

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把人間的成敗勝負看爲蝸角之爭，是哲人的超然物外，但戰爭的殺戮，人化爲異物的殘酷，又非哲理可以化解。斷送江山，就像灌莽叢中草蟲誤落兒童手一樣無奈，名將勇士殉國，竟亦戰骨速朽。英雄已矣，瓦礫中蟋蟀淒切鳴聲，是憑弔故國的哀音<sup>67</sup>。

〈蟋蟀盆歌〉的主調是傷悼而非譏評。嗜蟋蟀雖然代表輕重倒置與國事荒廢，但蟋蟀之戲又與明朝命運交織在一起：「秘閣圖書遇兵火，廠盒宣窰賤如土。名都百戲少人傳，貴戚千金向誰賭？」新朝以鷹隼馳逐爲戲，鬪蟋蟀無人問津。離亂中的崩壞鉅細無遺：大內藏書毀於兵火，而蟋蟀盆與當時其他名器一樣被賤視。空蕩淪落的蟋蟀盆遂成爲亡國悲哀的象徵：「樂安孫郎好古癖，剔紅填漆收藏得。我來山館見雕盆，蟋蟀秋聲增歎息。嗚呼！漆城蕩蕩空無人，哀蟻切切啼王孫。貧士征夫盡流涕，惜哉不遇飛將軍。」案《史記·滑稽列傳》，秦二世欲漆城，優旃寓諷於勸：「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sup>68</sup>此處漆城是對奢華靡費的譏彈，亦是「寇來」竟「能上」劫後餘生的感喟。蟋蟀蕭颯秋聲，因爲同音別名而與末世王孫的悲哀連結。（據《方言》，楚謂蟋蟀爲虵孫。）總結全詩的「不遇」、「知遇」母題，有多層意義。昔年徐、常輩得遇朱元璋，造就開國的風雲際會。宣宗對蟋蟀獨垂青盼，草蟲的殊遇暗示才人的不遇。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不遇飛將軍李廣，可哀者又不限於不受憐恤的「貧士征夫」。不復在盆中酣戰的蟋蟀，無人顧盼，又像李廣不遇知音。易代之際真、假王子，真、假王妃混淆視聽<sup>69</sup>，苟延殘喘的南明諸王，是否真命天子，這種種歷史線索使「認知」「知遇」充滿矛盾與危殆。而處於亂世的蟋蟀盆得遇具「好古癖」故能認清其價值的孫承澤，不至於與「廠盒宣窰」一樣「賤如土」，則是前朝遺物的慶幸，亦是文化延續與歷史記憶的明證。

<sup>67</sup> 以蟋蟀哀音寄家國之感，文學史中常見，姜夔〈齊天樂〉詠蟋蟀即爲一顯例。

<sup>68</sup> 司馬遷：《史記》，第10冊，卷126〈滑稽列傳〉，頁3203。

<sup>69</sup> 參看張廷玉等：《明史》，第26冊，卷196，頁7943；〔清〕錢澄之撰，湯華泉校點：〈假親王〉、〈假后〉、〈假太子〉，《藏山閣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頁85-86；〔清〕陸應暘編輯：《樵史通俗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頁264-270、286-291；〔清〕錢馱：《甲申傳信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54-158。

### 三、玩物與進退出處

審美文化是文人的共識，透過審美視野的共有空間，政治矛盾可以淡化。詳審清初遺民與「貳臣」的交往，往往與離不開文酒之會及聲華玩物的「審美活動」。清初大吏以賞鑒知名者如孫承澤、周亮工(1612-1672)等，均與遺民有密切往還。易代之際士大夫的抉擇——即是否出仕新朝——又與他們的鑒賞收藏行徑息息相關。在明亡動亂中，大族敗落，巨室收藏流散，屢見不鮮。當時有能力繼續蒐購名跡者，泰半是貳臣新貴。孫承澤即為一顯例。承澤崇禎時官兵科給事中，李自成破北京後歸降大順，入清官至吏部侍郎。孫氏經學、史學、理學各方面著作頗豐，但大都湮沒無聞，而其鑒賞與收藏，卻歷來為藝林稱賞。四庫館臣薄其變節，指稱他「自知為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為重」<sup>70</sup>，但亦認許他習掌故，精賞鑒。傳世之作較為人知者，有《春明夢餘錄》與《庚子銷夏記》等。

《庚子銷夏記》乃一六六〇年承澤退居後所作，始自四月，迄於六月，故以銷夏為名。卷一至卷三錄所藏晉、唐至明書畫真蹟，卷四至卷七錄古石刻，卷八寓目則記他人所藏而曾為承澤所見者，標題評鶩，議論考據，頗稱精闢詳實。書中孫氏屢屢述及他物識蒐尋從明故宮與大族收藏流出的法書、名畫、彝器、珍玩，其不遺餘力處，謝正光認為大類近人之搶救文物<sup>71</sup>。經過亡國的兵燹劫難，北京變成「文物市場」。孫承澤一直家住北京，鑒賞識見得以充分利用：

洪谷子以山水專門，為古今第一。甲申之變，名畫滿市，獨無浩畫。一日見從故內負敗楮而出者，浩畫在焉。然已破爛之甚。余使善手重裝，見絹素之內，復有重絹。亦一奇也。其山與樹皆以秃筆細寫，形如古篆隸，蒼古之甚，非關、范所能及也。令朴兒收之，貯海雲閣。<sup>72</sup>

荊浩（約 855-915）畫在明末清初已是極為罕見，細案孫氏語氣——「名畫滿市，獨無浩畫」——卻像是期待與預想可以遇見。雖然鑒賞的詞彙沒有改變——「蒼古之甚」是沿用的贊語——但世變賦予鑑賞與收藏火盡薪傳的文化意義。

類似的記載書中比比皆是。如卷一〈褚河南遂良書孝經閣立本畫〉乃「滄

<sup>70</sup>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18，頁144。

<sup>71</sup> 參看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40。

<sup>72</sup>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6冊），卷3，頁9b-10a。

桑後得自故內」<sup>73</sup>，卷三〈李伯時袁安臥雪圖〉，似是孫氏購自不識貨之俗子：「『臥雪圖』爲龍眠有名之蹟。一僮父自故內得之，以上有龍暝印，不知暝即古眠字也。余見驚嘆欲絕。」同卷〈關仝山水〉：「余求關仝畫不可得，忽於故內得一幀，已壞絕，而畫體不傷。」<sup>74</sup>他如卷一〈孫過庭書譜墨蹟〉：「甲申忽觀此卷，驚歎欲絕。以市賈索價太昂不能收，惜惋竟日……越六年復見於西川士夫家，以予愛之特甚，乃許購得。」<sup>75</sup>卷二〈趙子昂千文墨蹟〉：「乙酉之秋偶於棋盤街下馬牌側見此卷，傾囊得之。」<sup>76</sup>

圍繞這些書畫石刻聚首的同好，在《庚子銷夏記》中亦有描述。

甲申後，銅駝既在荊棘，玉盃亦出人間。二三同好，日收敗楮斷墨，以寄牢騷。予有墨緣居在室之東，或有自攜所藏，間相遇從，千秋名跡，幸多寓吾目焉。追憶紀之。<sup>77</sup>

「以寄牢騷」，語境頗爲含渾，其政治性可濃可淡，可解讀爲對前朝的追懷，亦可看成是泛泛的悵鬱<sup>78</sup>。此等「敗楮斷墨」引發的感懷，包容了對新朝不同的態度。我們已無從知道「二三同好」所指何人，但孫承澤與遺民的交往在清初詩文中有所尋。據謝正光的考證，顧炎武曾借讀孫氏的藏書，朱彝尊亦曾以他的鑒賞博識受知於孫氏<sup>79</sup>。（案朱彝尊與孫承澤的交游期間——即一六六七至一六七六年——朱尚未赴博學鴻詞試，還算是遺民。）由此可知，鑒賞與收藏界定一種文化空間與審美空間。在此空間裏，政治抉擇的分歧可以擱置，文酒社集之交誼可以持續。

政治氛圍的淡化，又見於孫承澤本人及其友人所表彰的隱逸情懷。顯宦多年後，孫氏於一六五三年辭官，退居後自號退谷逸叟。《庚子銷夏記》序中洋溢著閒適之情：「倘佯少許，復入書舍。取法書、名畫一二種，反復詳玩，盡領其致。然後仍置原處，閉扉屏息而坐。」<sup>80</sup>吳偉業在贈孫承澤的〈退谷歌〉裏，把

<sup>73</sup> 同前註，卷1，頁7a。

<sup>74</sup> 同前註，卷3，頁3a、11a-b。

<sup>75</sup> 同前註，卷1，頁3a-b。

<sup>76</sup> 同前註，卷2，頁1a。

<sup>77</sup> 同前註，卷8，頁1a。

<sup>78</sup> 如以牢騷聯想到〈離騷〉，則隱然有故國之思。（一自揚雄作〈畔牢愁〉反騷，即有以牢騷解釋〈離騷〉者。）

<sup>79</sup>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348-356。

<sup>80</sup>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1，頁1a-b。

孫氏的退谷別業寫成避世逃時的樂土。詩大概作於吳仕清身在北京的兩年，即一六五四至一六五六年間。吳偉業在一六五三年身不由己倉皇北上出仕新朝以後，詩中所表現的，無非愧疚與自責。雖然客觀說來孫、吳二人以明臣仕清的身分並無二致，但〈退谷歌〉卻以詩人的困頓反襯孫氏的解脫：

使我山不得高，水不得深，鳥不得飛，魚不得沉。武陵洞口聞野哭，蕭斧斫盡桃花林。仙人得道古來宅，劫火到處相追尋。不如三輔內，此地依青門，非朝非市非沉淪。<sup>81</sup>

陶潛的桃花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避秦亂演成逃離歷史的象徵。但〈退谷歌〉中的武陵洞口與桃花林則是劫數難逃。相反地，逼近京城，夾在三輔青門等政權標誌之間的退谷，竟化為非進非退，亦進亦退，「非朝非市非沉淪」的兩可之境。以玩物游移仕隱之間，本是套話，更是晚明文學一大命題<sup>82</sup>，卻因清初的特殊政治環境深化和轉化。鼎革之際進退出處之矛盾，可能因一部分士人的惶愧與悲哀而更需要調和與化解。此中消息，竟似是以鑒賞與收藏作為逃避歷史矛盾的根據。

士人出處之際志行的真偽，文化網絡引進的折中與包容，又可藉賞鑒的語境探討。試舉冒襄(1611-1693)〈宣銅爐歌為方坦菴年伯賦〉及〈宣爐歌註〉為例。冒襄，字辟疆，如皋人，明末四公子之一，以風節文章負重望，主持復、幾二社，入清不仕。方拱乾(1596-1666)，號坦庵，桐城人，一六一八年與冒襄之父冒起宗(1590-1654)同舉於鄉，一六二八年又同科登進士，累官翰林院編修、詹事府少府<sup>83</sup>。一六五四年受薦任翰林院侍講，旋復前明原官。一六五九年因其子章鉞牽連丁酉科場案，全家（除了六子奕藏）流放寧古塔，一六六二年赦歸北

<sup>81</sup> 吳偉業：〈退谷歌〉，〔清〕靳榮藩輯注：《吳詩集覽》（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四部備要》本），第3冊，卷6上，頁15b-17a。

<sup>82</sup> 如陳繼儒聲稱種花賞花「可以長世」、「可以經世」、「可以避世」、「可以玩世」。〔明〕陳繼儒：〈花史題詞〉，見胡紹棠選注：《陳眉公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44。又如袁宏道認為山水花竹「隱者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為，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得者也」，只有賞玩瓶花適宜他「身居隱見之間」的身分，〔明〕袁宏道：〈瓶史引〉，見熊禮匯選注：《袁中郎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267。

<sup>83</sup> 〔清〕冒襄：〈祭方坦菴年伯文〉，《巢民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99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7，頁9a-13b。方氏是桐城望族，族中有著名遺民如方以智、方文等，亦有受薦得第仕清者，詳謝正光：〈讀方氏盦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實小議〉，《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60-108。

京。次年移居揚州，冒襄前往拜見，〈宣銅爐歌〉即作於此時<sup>84</sup>。在繫一六六六年的〈祭方坦菴年伯文〉，冒襄細述兩家在一六四五年同避難鹽官，其時冒襄病危，而尚與方拱乾及其子姪賦詩抒懷。冒襄又回憶這次揚州聚首，「重見父執，如見吾父，悲喜交并，不能自已……至于揚扈風雅，商訂筆墨，倡和宣爐，無一聚不盡驩，無一字不溢贊……並敘三世一堂之好，真二十年來最苦中樂事」<sup>85</sup>。

據大木康考證，冒襄與方拱乾的交誼，及冒、方二人之亂世悲感，可藉他們有關宣爐的詩作揣量<sup>86</sup>。方拱乾出關時將珍藏的宣爐交付其六子奕箴，三年後赦歸時奕箴攜來相奉，拱乾悲喜交集，因詠〈再見宣德爐〉三首<sup>87</sup>。第一首感念與宣爐相別而竟能重逢的驚喜：「意中光恠，拂拭更離離。」第二首藉超越人事變遷之宣爐寄興：「堅脆經離亂，相看不壞身。」第三首云：「迫隨還屈指，四十有三年。况復前朝鑄，久爲當代憐。名山誰不朽，香案亦空傳。好拭摩娑眼，松龕晝夜煙。」據此方拱乾是在萬曆末年（約1619年前後）獲得宣爐，其時正當年少。宣爐經歷朝代興替，仍爲人所寶愛，方氏本人則是歷盡滄桑，深感得失之空幻。希冀著作能像司馬遷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乃非分之想，故曰「名山誰不朽」，而作「玉皇香案吏」代表的自矜得天獨厚亦已蕩然無存<sup>88</sup>。重逢宣爐，再次拂拭時，已如隔世。覷破虛空，是已似乎只看到奉佛松龕的裊裊爐煙。

冒襄詩通過宣爐的文化及歷史意涵重申冒、方二家族世誼，並緣飾方拱乾進退出處種種決定之合理性：

龍眠先生鬚髯皤，兩朝鼎貴稱鳴珂。絲綸世掌遭遷播，邗江賣字書擘窠。

<sup>84</sup> 冒襄：〈宣銅爐歌爲方坦菴年伯賦〉，《巢民詩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99冊），卷2，頁12b-13b。〈宣爐歌註〉，〔清〕張潮、楊復古、沈懋德等編輯：《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甲集，卷43，頁80-81。詩及註繫年，參冒廣生編訂：《冒巢民先生年譜》（清光緒戊申年《如皋冒氏叢書》本），頁50a-51a。

<sup>85</sup> 冒襄：《巢民文集》，卷7，頁11b-12b。

<sup>86</sup> 大木康：〈宣爐因緣——方拱乾と冒襄〉，《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5集（2003年10月），頁166-180。

<sup>87</sup> 〔清〕方拱乾：〈再見宣德爐：出塞時屬兒奕箴攜來奉老夫玩〉，《甦庵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79冊影印清康熙錫善堂鈔本），頁92b-93a。

<sup>88</sup> 元稹謫居越州有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見〔唐〕元稹：〈以州宅夸於樂天〉，見《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2冊，卷417，頁4599。越州因有蓬萊閣之名。香案吏，或指別具仙骨，或指得近帝聽。唐置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4冊，卷47，頁1208。

生平嗜古入骨髓，玩好不惜三婆婆。有爐光怪真異絕，肌膩肉好神清和。  
窄邊蚰耳藏經色，黃雲隱躍窮瑠磨。窪隆豐殺中規矩，紅榴甘黛紛雷蜩。  
我時捧視驚未有，精光迸出呼奈何。恭聞此爐始宣廟，制器尚象勤搜羅。  
宮閨風雅厭奇巧，爐構精妙無偏頗。或云流烏一夜鎔寶藏，首陽銅枯汁流  
醜。或云煉銅十二取輕液，式倣官瓷非鬲犧。彝乳花邊稱最上，魚蚰諸耳  
無相過。博山睡鴨真俗醜，宋燒江製咸差訛。工倕撥臘昭千古，香籠火煖  
浮金波。宜香宜火宜几席，寧惟鑒賞堪吟哦。百金重購擬和璧，梅檀函貯  
文犀馱。後來北鑄並南鑄，道南施蔡皆么麼。亂真火色終枯槁，磨治雕鑿  
蛟龍呵。平生真賞惟懺閣，同我最好沈江河。撫今追昔再三歎，憐汝不異  
諸銅駝。一爐非小關一代，列聖德澤相漸摩。我今爲公作此歌，萬事一往  
何其多。歌成乞公書大字，明日且換山陰鵝。<sup>89</sup>

冒與方雖然仕隱殊途，但兩家交誼如故。冒襄以遺民自居，卻頌揚方拱乾「兩朝鼎貴」。爾後冒襄〈祭方坦菴年伯文〉稱述「年伯應召，再踐宮詹」及其六子清初得第，亦隱然讚譽。方氏是龍眠（安徽桐城）鼎族，世代簪纓。冒襄感嘆「絲綸世掌遭遷播」，是致慨飄零遠戍之不平。經歷遷謫與流徙的方拱乾，邗江賣字，嗜古入骨，寄情宣爐，在文人文化中重新安身立命。冒襄亦善書學篆大字，晚年困頓，亦曾靠賣書畫幫補生計。無論困厄因由爲何，冒、方二人以文人文化作爲精神資源之取向是相近的。詩中有關宣爐的術語，若非參考〈宣爐歌註〉不易明白。宣爐不規三代鼎鬲，而仿宋瓷爐樣式，即冒詩所謂「式倣官瓷非鬲犧」。「蚰耳」、「紅榴」、「彝乳花邊」、「魚蚰諸耳」等均指極品宣爐之耳及足的樣式。〈宣爐歌註〉：「宣爐以百摺彝乳足，花邊魚鰓蚰蚰諸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圓鼎爲最。」<sup>90</sup>所謂「藏經色」和「黃雲隱躍」，則指宣爐淺淡而精妙的色澤，識者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棠梨褐色而藏經紙色爲第一。」（〈宣爐歌註〉）比起宣爐，時俗所尙的博山爐、睡鴨爐相形見絀。「宋燒江製咸差訛」，可能是指〈宣爐歌註〉中述說的「本色之厄」。嘉靖隆慶前尙仿宋燒斑，故有取本色爐重加燒斑者。「江製」未詳所指，可能是與某地因過求色淺琢磨太甚的製作過程有關，亦即註中所謂本色之厄其二。方拱乾的宣爐，大概不落此等俗套，得免「宋燒江製」的謬誤。工倕相傳爲堯時巧匠<sup>91</sup>，

<sup>89</sup> 冒襄：《巢民詩集》，卷2，頁12b-13b。

<sup>90</sup> 張潮：《昭代叢書》，甲集，卷43，頁81。

<sup>91</sup> 《荀子·解蔽》：「倕作弓」；《墨子·非儒下》：「巧垂作舟」；《莊子·達生》：

撥蠟是鑄銅之法。宣爐通過神話化，直可照耀千古。

冒詩並註三復致意真假的問題。「後來北鑄並南鑄，道南施蔡皆么魔。」據〈宣爐歌註〉，仿製或偽造宣爐者，有嘉靖後之學道及明末清初更爲不逮的施家：「皆北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冶，寒儉無精采。」<sup>92</sup>此外又有蔡家、甘家的南鑄傳統。但冒襄認爲這些都是不足亂真、乏善可陳的「么魔」。判別真假的關鍵是宣爐的「奇光」。冒襄以擬人法比作肌理神情：「有爐光怪真異絕，肌膩肉好神清和。」正如人的特異處不容摹擬，這「奇光」界定真假：「亂真火色終枯槁。」據〈宣爐歌註〉：「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正如好女子肌膚柔膩可搯。爇火久，燦爛善變。久不着火，即納之汙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槁矣。」<sup>93</sup>此處取譬女子風貌精神，是晚明習氣的流風餘韻<sup>94</sup>。善變而不變、納於汙泥而無損的真色，有似神超形越，不囿於歷史變遷和個人境遇的真性情。《同人集》載方拱乾〈爲宣爐謝辟疆〉：「爐傳宮鑄舊，得子品題真。」宣爐之「真」通過冒襄品題而坐實。慨歎「物亦感知己」，方代爐感謝冒襄<sup>95</sup>。

張潮（1650-1707年前後）把〈宣爐歌〉及註收入他編輯的《昭代叢書》，並附小引與評點<sup>96</sup>。張潮雖生於清初，但顯然嚮往晚明的趣味與生命情調<sup>97</sup>。張評冒襄真色之論：「古今人品文章判斷略盡。」〈宣爐歌註小引〉又云：「所恨麇鼎紛陳，不可勝詰，非巨眼莫能辨之。良由愛之者多，則其值益貴，值益貴，則麇者日繁。甚且一爐剖而爲二，半真半偽，若兩截人物。噫，抑何巧也。」<sup>98</sup>內外不符，進退失據，或身仕兩朝者，世斥爲兩截人——如一六七九年孫枝蔚準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sup>92</sup> 張潮：《昭代叢書》，甲集，卷43，頁81。

<sup>93</sup> 同前註，卷43，頁80。

<sup>94</sup> 孫承澤在《硯山齋雜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2冊）卷四和王士禛在《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十五引〈宣爐歌註〉時均刪去此句，不知是否覺得這譬喻稍乖雅馴。宋學〈宣銅琴爐三十韻〉則有類似譬喻：「摩挲鑑避光，細膩肉偏洽。潤婉端溪珍，秀奪美人頰。」〔清〕宋學：《西陂類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3冊），卷9，頁29b。

<sup>95</sup> 冒襄輯：《同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85冊影印清康熙冒氏水繪庵刻本），卷6，頁73a。

<sup>96</sup> 《昭代叢書》三集一百五十卷，刻於一六九七—一七〇三年。

<sup>97</sup> 參Allan H. Barr, "Novelty,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in Zhang Chao's *Yu Chu xinshi*,"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sup>98</sup> 張潮：《昭代叢書》，甲集，卷42，頁80。

備赴博學鴻詞試，杜濬即告誡他「毋作兩截人」<sup>99</sup>。張潮隱然以真爐比附志節始終不渝的「真人」。但冒襄更關注的，似乎是「真賞」。真賞基於史識，亦即對宣爐的製作與流傳的感悟：「或云流烏一夜鎔寶藏，首陽銅枯汁流醜。」流烏指火，據《史記·周本紀》，武王伐紂，有流烏之瑞：「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sup>100</sup>「首陽銅」亦是用《史記》典故，〈孝武本紀〉《索隱》註鼎湖：「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sup>101</sup>〈宣爐歌註〉云：「宣廟時，傳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爐。」<sup>102</sup>冒詩藉流烏意象化災爲祥，宣殿火災造就鎔鑄精光的契機，使枯槁的銅器因與金銀珠寶融合而變爲引起美女醉顏之聯想的「流醜」。宣爐代表歷劫與再造，其奇光就像是當年金銀銅器與珍寶焚鎔結合，再鑄爲爐的驗證。

真賞藉博雅呈現，是以冒襄品第宣爐，考據詳賅。〈宣爐歌註〉辨識尤精的是宣爐「本色之厄」——物主因恐俗眼生疑，過求本色之露，以致重燒、再磨、鑿款，欲益反損。宣爐如有神物所附，定必呵責如斯褻瀆，即冒詩所謂「磨治雕鑿蛟龍呵」。真賞又超越個人得失，追蹤歷史意義：「平生真賞惟懺閣，同我最好沈江河。撫今追昔再三歎，憐汝不異諸銅駝。」註云：「懺閣乃毘陵鄒臣虎先生供吳道子觀音真蹟處。每與先生閣前鑒賞宣爐，自天雞圓鼎外，凡六七種，余有別記。余最妙一二，統散失于甲申乙酉。」<sup>103</sup>冒襄本人珍藏的宣爐，已於一六四四、一六四五年間全家過江避難時沉沒。方拱乾保存的宣爐，無異荊棘銅駝。銅爐既以朝代年號命名，便是代以物傳。正因如此，真賞不遑追進退出處，而是通過「筆墨宣爐」的「藝術再造」延長歷史記憶：「我今爲公作此歌，萬事一往何其多。歌成乞公書大字，明日且換山陰鵝。」冒襄請求方拱乾以擘窠大字書寫〈宣銅爐歌〉，而他自己就取法山陰道士拿好鵝換取王羲之書寫的《道

<sup>99</sup> [清]杜濬：〈與孫豹人書〉，《變雅堂遺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94冊影印清光緒二十年黃岡沈氏刻本），《文集》，卷4，頁3a-4b。

<sup>100</sup> 司馬遷：《史記》，第1冊，卷4，頁120。董仲舒對策引此爲《書》所云（班固：《漢書》，第8冊，卷56，頁2500），是說又收入今文〈泰誓〉。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司馬遷：《史記》，第1冊，卷4，頁121裴駟《集解》）

<sup>101</sup> 司馬遷：《史記》，第2冊，卷12，頁460。

<sup>102</sup> 見張潮：《昭代叢書》，甲集，卷43，頁81。關於這傳說，孫承澤曾辨其非，見孫承澤：《硯山齋雜記》，卷4，頁17a-b。

<sup>103</sup> 張潮：《昭代叢書》，甲集，卷43，頁81。

德經》<sup>104</sup>，準備酬勞。歷史記憶彰顯代以物傳，即〈宣銅爐歌〉所謂「一爐非小關一代，列聖德澤相漸摩」。然而這大題目背後自有不可磨滅的生活情趣之記憶：「宜香宜火宜几席，寧惟鑒賞堪吟哦。」杜濬評此二句：「本色受用，淺人說不出。」<sup>105</sup>大木康指出冒襄的宣爐記憶，實包含他與董白的情緣<sup>106</sup>。《影梅庵憶語》中述宣爐燒香，風光旖旎。又董白因曾見「覆祥雲真宣爐，款式絕佳。請以覆祥對乞巧」<sup>107</sup>，鐫摹覆祥乞巧字樣於釧上，而後來竟有斷釧之讖。歷史記憶與兒女情長不可分割，具見以下有關風雅與氣節的論述。

#### 四、風雅與氣節

明亡之後，不與新朝合作的士人習稱為遺民。但遺民的定義有寬嚴，其中物質生活的抉擇，及對新朝與貳臣的態度也多不一致<sup>108</sup>。有些以苦節著稱的遺民在悔罪與捨棄意識下「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sup>109</sup>。如徐枋(1622-1694)戲劇性的與世訣絕：「終其身以書畫自給，足不入城市。豢一驢，甚馴，能知人意。有所需，則以書畫卷置一麗驢背上，驢乃獨行至城，立城闔間，不闌出一步。市人見之，咸謂『高士驢至』，取其卷，如所指備物而納諸麗。」<sup>110</sup>又如李確(1591-1672)「數十年不入城市」，「山中糧絕，或給以酒米，非其人，雖饑勿受也」<sup>111</sup>。這類高蹈之士以奇窮見志節。

身無長物的遺民，當然談不上玩物，但卻可以重新界定「物」的價值。如林古度的萬曆錢、巢鳴盛的匏杯，都是遺民詩人引以自況並因而自貴之物。林

<sup>104</sup> 房玄齡等：《晉書》，第1冊，卷80，頁2100。

<sup>105</sup> 張潮：《昭代叢書》，甲集，卷43，頁81。

<sup>106</sup> 大木康：〈宣爐因緣——方拱乾と冒襄〉。

<sup>107</sup> 冒襄：《影梅庵憶語》，收入吳定中編著：《董小宛匯考》（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頁155。

<sup>108</sup> 參拙作：“Introduction: Existential, Literary, and Interpretive Choices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pp. 1-70。

<sup>109</sup>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年），頁405-456；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sup>110</sup> [清]徐鼎：《小腆紀傳》（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臺灣文獻叢刊》，第138種），第5冊，頁800-801。

<sup>111</sup> [清]沈季友：《橋李詩繫》，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第1冊，頁40；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上冊，卷1，頁10-11。

以兒時一萬曆錢，佩之終身<sup>112</sup>，標示追懷故國，無求於當世。吳嘉紀爲賦〈一錢行〉<sup>113</sup>。巢鳴盛隱迹深林，「遶屋種匏，小大凡十餘種……室中所需器皿，莫非匏者。遠邇爭傲之。樵李匏樽，不經而走，海內孝廉作長歌詠焉。」<sup>114</sup>巢又作〈題匏杯〉、〈大匏賦〉以見志<sup>115</sup>。匏味苦不能食，只能繫之浮諸江海，可說是與社會及政治現實疏離的象徵<sup>116</sup>。晚明談物，本有提升個人愛憎使之成爲價值來源的論調。這觀點在清初與政治糾纏以後，私人象徵遂變成政治反抗的暗喻。

遺民世界極其複雜多元，並不限於苦節。有些遺民雖經歷明清之際的動亂，但家業不墜，依舊保存了財富和影響力，有的更銳意經營結合風流與氣節的精神境界。如海寧查繼佐(1601-1676)以史學知名，又好講論存誠經濟之學，另一方面，「甲申後家居，極文酒聲伎之樂」<sup>117</sup>，「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時稱『十些』」<sup>118</sup>。如皋冒襄，更可作爲東南「風流遺民」的代表<sup>119</sup>。他堅執拒絕清廷徵詔<sup>120</sup>，卻又談藝談情，風懷感舊不衰。冒襄與名妓董白的姻緣，爲世艷稱。一六五一年董白夭亡，冒襄追記情緣作《影梅庵憶語》。《憶語》中的董白，慧心巧思，多情善悟，不僅才、色、藝俱絕，更體現了理想的道德人格。易代之際的轉徙流離，正足以彰顯董白志節的堅貞。冒襄以婉側的筆調，肯定了風流與節操的相輔相成。《憶語》表現了晚明唯美精神與閑賞文化

<sup>112</sup>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卷2，頁282；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上冊，頁21。

<sup>113</sup> [清]吳嘉紀著，楊積慶箋校：〈一錢行贈林茂之〉，《吳嘉紀詩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41。

<sup>114</sup> [清]朱彝尊：《明詩綜詩話》，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第1冊，頁353。

<sup>115</sup> [清]黃宗義：《思舊錄》，《黃宗義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冊，頁373。

<sup>116</sup> 參見徐元誥撰，王樹民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魯語〉，頁182-183。《論語·陽貨》：「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宋]朱熹：《四書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90年），頁120。錢穆：《莊子纂箋》（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1957年），〈逍遙遊〉，頁6。

<sup>117</sup> [清]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第1冊，頁113。

<sup>118</sup> 阮元《兩浙輶軒錄》引《巖門詩話》，同前註，頁113。有關查繼佐家畜女伎，楊聖聖、丁耀亢、毛奇齡均有題詠，參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上冊，卷1，頁28-29。相傳降清將軍吳六奇微時，乞食至查家，受查繼佐器賞，後查因明史案受牽連，賴吳周旋得免。蔣士銓《雪中人》傳奇譜其事，避談明史案，卻極力鋪陳查氏家樂。

<sup>119</sup> 如韓奕即云：「蓋自先生歿而東南故老遺民之風流餘韻於是乎歇絕矣。」[清]韓奕：〈冒潛孝先生墓誌銘〉，收入冒襄輯：《同人集》，卷首，頁1a-4b。

<sup>120</sup> 冒襄辭薦，同前註。又參冒廣生：《冒巢民先生年譜》，頁59a-60b。

在清初以「道德化」的姿態延續。

冒襄等文人集團的生命情調，與前略述的遺民苦節剛好相反。他們把文酒社集，甚或徵歌選色變為政治立場，因為他們不僅是前朝所遺，亦是疇昔風流所遺。風流遺民反映了公與私、兒女與英雄、藝術境界與道德境界之間表面對立而暗地相通，看似壁壘森嚴的分野其實並非不可湊泊。冒襄在垂暮之年，把自己與師友門生酬唱往還的詩文書信編次為《同人集》<sup>121</sup>，裏面文字多次提出冒襄等人的遺民懷抱，是藉追慕明季騷雅優游，哀悼風流雲散而表達的。《同人集》收錄不少仕清官吏，但亦有抗清烈士、隱逸高人，並包括觸犯清廷如錢謙益、陳名夏等，也許為此《同人集》後來被清廷列入禁毀書目。一六六〇年，以講學負盛名的陳瑚(1613-1675)偕弟子瞿有仲訪冒襄於水繪園。酒行樂作，陳瑚欲辭而終復坐，及演《燕子箋》，陳再次避席，並述說今昔之感。明亡前陳瑚看過《燕子箋》，曾幾何時而江山陵谷巨變。來訪如皋的旅途中，「所見皆馬矢駝塵，黃沙白草，問昔年之故人，死者死而老者老矣」<sup>122</sup>，所以不忍終曲。冒襄於是憶述一六四三年金陵罵座，一邊看《燕子箋》，一邊詬冒阮大鍼，幾乎致禍<sup>123</sup>。冒襄復辯解說：

迄于今，懷寧之內已在晉軍，梨園子弟復更幾主<sup>124</sup>。吾與子尚俯仰醉天，偃蹇濁世，興黃塵玉樹之悲，動喚宇彈翎之怨，謂之幸耶？謂之不幸耶？予之教此童子也，風雨蕭蕭，則以為荊卿之歌；明月不寐，則以為劉琨之笛；及其追維生死，憑弔舊游，則又以為謝翱之竹如意也。<sup>125</sup>

瞿有仲亦引述冒襄的話，認為他借聲色韜晦，寄其憂愁憤懣：

獨其溺情聲歌，有以此少先生者。夫先生之心，誰其知之。乃先生正藉人之不知，而謂可以逃吾情而寄吾志也。記觀劇之夜，先生指童子而語余曰：時人知我哉。風蕭水寒，此荊卿筑也。月樓秋榻，此劉琨笛也。覽雲觸景，感古思今，此臯羽竹如意也。故予之教此，每取古樂府中不合時宜

<sup>121</sup> 《同人集》的編刻，約自一六七三年始，直至冒襄臨終前不久才完成。

<sup>122</sup> 冒襄輯：《同人集》，卷3，頁5b。

<sup>123</sup> 觀劇罵阮，事詳陳維崧：〈奉賀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蘇孺人五十雙壽序〉、吳偉業：〈祝冒辟疆社盟翁先生雙壽序〉，收入冒襄輯：《同人集》，卷2，頁1a-7b。孔尚任把此事譜入《桃花扇》第四齣〈偵戲〉。

<sup>124</sup> 易代之際巨室家樂班多解散，冒氏家樂班可能收容了阮大鍼等家樂班的演員和教習。參王利民、丁富生、顧啓：《冒辟疆與董小宛》（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54。

<sup>125</sup> [清]陳瑚：〈得全堂夜譚記〉，收入冒襄輯：《同人集》，卷3，頁5a-6b。

者教之，祇與同心如子者言樂耳，終不以悅時目。<sup>126</sup>

二十年後（1680年）冒襄故交，以《板橋雜記》著稱於世的余懷（1616-1696），在冒家屢經禍患衰敗以後，仍操持同樣論調：

自我觀之，巢民之擁麗人，非漁於色也。蓄聲樂，非淫於聲也。園林花鳥飲酒賦詩，非縱酒泛交買聲名於天下也。直寄焉爾矣。古之人胸中有感憤無聊不平之氣，必寄之一事一物以發洩其堙曠。<sup>127</sup>

李清（1602-1683）在〈同人集序〉中說：「喪亂以來，辟疆所閱歷者，兵戈之搶攘，山川之險阻，禍患疾病之顛連，靡不畢備。王謝家長物，半就散落，而故人筆墨，則獨守而弗失。」<sup>128</sup>《同人集》保存了由明入清一代文人的精神面貌，有特殊的文化意義。李清以為珍玩的散失與文字的積聚形成對比，但《同人集》中屢屢提到「長物」，好些詩文往還均與書畫玩好的收藏與鑑賞有關。一六七九年冒家寶彝閣與染香閣燬於火災，冒襄收藏的書畫鼎彝古玩化為灰燼<sup>129</sup>。冒家漸漸陷入窘境，但冒襄仍然勉力以有限資源繼續蒐購名蹟珍玩。他收藏的五十三種硯山只有一座倖免祝融，但後來在一六八七年，冒襄獲得據稱是米芾「寶晉齋中物」的硯山。傳說硯山是南唐李後主之物，後收藏宋宮內府，米芾輾轉獲得後為之繪圖。冒襄門生張瑞為硯山作一正一背二圖，並於跋中述稱「時師遊鑾江邗上幾半歲，盡空游橐，載書畫玩好而歸」。張瑞刻意形容硯山和在座眾人的觀賞興致：「日命酒攜親串縱觀，因得從諸君子之後擊節歎賞，最後出米老寶晉齋研山一座，峯巒洞壑，泉澗瀑布，靡不具足，座客有觀止之歎。」<sup>130</sup>藏天下於芥未微物，是想像空間的展現，亦是避世逃時的寄託，這常見的話題在易代之際有特殊意義。查士標（1615-1698）亦為硯山作圖，並聲稱硯山既有公認的價值，亦是冒襄私淑古人的驗證：「巢民先生遊白沙，得半岩飛瀑石，為寶晉齋中物，傳示同好，爭歎奇絕……而先生愛石成癖，又得此石，直可尙友南宮，把臂入林。」<sup>131</sup>

<sup>126</sup> [清] 瞿有仲：〈巢民冒先生五十榮壽序〉，同前註，卷2，頁19b。

<sup>127</sup> 余懷：〈冒巢民先生七十壽序〉，同前註，卷2，頁46b。

<sup>128</sup> [清] 李清：〈同人集序〉，同前註，李序頁3b。

<sup>129</sup> 時人以寶彝閣比美錢謙益絳雲樓，二樓燬是東南圖書載籍二大厄難。冒襄在詩文中多次提到這次火災，參冒襄：〈補刻染香閣倡和〉跋、〈殘臘黃長甲過訪臨別書贈應其一涕不堪博笑也〉、〈巳未除夕二首步和羽尊原韻〉，同前註，卷7，頁48b、卷9，頁20a-b。

<sup>130</sup> [清] 張瑞：〈為巢民先生圖來石小跋〉，同前註，卷3，頁77a。

<sup>131</sup> 同前註，卷3，頁76b。米芾嗜硯復愛石，拜石為丈，是藝林熟知的掌故。有關查士標簡

鑒藏溯源於文化記憶。冒襄八十一歲那年(1691)，書童徐雛拿來兩幅遠客求售沒有款識的小畫，「裝潢盡脫，舊而且損」。冒襄展玩之際，驚絕非常：「余鑒藏六、七十年所罕見者。撫視久之，似還舊觀也。」所謂舊觀有二。其一是追憶項仲展中進士後到如皋拜謁房師即冒襄表伯李之椿，執贄皆古玩書畫，其中一卷是郭忠恕(約910-977)畫「唐太宗九成宮避暑圖」，又名「釣鰲圖」。所畫宮殿樓臺，複道迴廊，縮丈為寸，不差纖毫，卷後多名人題跋，「董先師(即指董其昌)小楷直贄為心死神活之技」。相比之下，二小幅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二是冒襄回想年少時因師事董其昌而看到他珍藏的董源(962年死)「瀟湘圖」，而二幅不但樓閣精工，更兼烟樹樵漁，直逼「瀟湘圖」神境。冒襄把這兩幅畫一名為「滕王閣圖」，一名為「岳陽樓圖」，鑒定是郭忠恕真迹。本來專工樓閣的畫家不甚取韻山水，就是畫山水也都是北宗，冒襄於是緒述郭忠恕尸解仙去的故事，因為「非仙人斷不能畫兼南北，又兩臻神品，獨擅千古。」這難得的奇遇顯示江左風流的延續亦是文化命脈的不絕如縷：「余年過八十，生平所藏盡灰燼于十年前。何復遭此。如其值售之，重為裝潢，特加看詳，以紀真賞。」其時寄寓冒家的戴本孝讚嘆冒與郭神交千古，「又能溯源窮流，博古精鑒」，是郭忠恕「八百年後子雲」，冒襄並不遜謝<sup>132</sup>。經歷滄桑巨變而能表彰異代，堅持風流餘緒，使冒襄本人也變為「文物」化身。誠如孔尚任(1648-1718)致書所云：「高讌清譚，連夕達曙，如對古人之典冊，如觀先代之鼎彝。」<sup>133</sup>

玩物未必喪志。王弘撰(1622-1702)以志節學術負盛名，為關中士人領袖，收藏古書畫金石最富，既為平生所嗜，集中亦多題識<sup>134</sup>。甲申殉難的倪元璐

介，參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第1冊，頁544-545。當時題詠，尚有徐倬、孔尚任、鄧漢儀、宋實穎等人的〈為巢民先生題米南宮半岩飛瀑圖歌〉，收入冒襄輯：《同人集》，卷10，頁51b-52b。

<sup>132</sup> 冒襄：〈跋鑒定郭恕先滕王閣岳陽樓圖二小幅畫〉，《同人集》，卷3，頁84a-85a。

<sup>133</sup> 同前註，卷4，頁107a。信中又提及孔尚任為冒丹書(冒襄子)謀職。然則「文物」身分可說是一種「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在文人交往中可帶來實際的幫助。經歷易代滄桑的人物比擬古玩，屢見清初文學。如宋琬〈題周櫟園所藏近代名人畫冊〉：「則此矚然二老，亦誠法物也哉。」見〔清〕宋琬著，辛鴻義、趙家斌點校：《宋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75-76。又如《桃花扇》試一齣〈先聲〉，老贊禮以副末開場：「古董先生誰似我，非玉非銅，滿面包漿裹。」〔清〕孔尚任著，王季思等註：《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卷1，頁1)反其意用之者，則有吳偉業《秣陵春》傳奇中的副淨真琦。真琦因奇醜，具夔龍紋、蝴蝶獸面等異相，渾名真古董。劇中生旦身經亡國，他們的情緣卻是以前朝遺物與珍異法書等「真古董」為媒介。

<sup>134</sup> 徐鼎：《小腆紀傳》，頁601。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卷2，頁168-169。

(1593-1644)，是著名學者詩人，又是明末海內屬望的大臣。黃宗羲 (1610-1695) 在《思舊錄》推許他「分別邪正，手障狂瀾」，但亦有記載他的誇飾好事：

先生頗事園亭，以方、程墨調硃砂塗墜牆壁門窗。門生魯元寵為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既而知之，以為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不亦可惜乎。先生導余登三層樓，正對秦望，其兩旁種竹數千竿，磨有聲。先生笑謂余曰：「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子以為何如？」先生殉節以後，余再過之，其地已化為瓦礫矣。此亦通人之蔽也。<sup>135</sup>

貴物賤用這母題，通常用來調侃世人「不識貨」，或慨歎真正愛物之難<sup>136</sup>。倪元璐索名墨調硃砂塗牆，則是典型晚明文人的自恣自賞，是以睥睨一切的姿態自我表現與自我詮釋。種竹數千竿於高岡，違反了以竹臨水的園亭設計常規，倪元璐認為匠心獨運，沾沾自喜。對這種奢華自詡，黃宗羲薄有微辭。園亭廢為荒墟，使他在悵歎之餘，下了「通人之蔽」的斷語。黃宗羲感喟「役于物」的徒勞，卻不認為風雅有妨氣節。他在追記另一位明末名臣范景文 (1587-1644) 的時候，也是以志節始，以風雅終。范景文清流卓識，留心著述，虛懷下士，國變投古井殉節。黃宗羲在結語緬懷他耽玩書畫的清興：

余謁公，公出其書畫，賞玩終日，有宋刻〈爭坐位帖〉，神宗賜奄人以抵俸者，公欲鈎勒重刻。公有家樂，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采，照映一時。由是知節義一途，非拘謹小儒所能盡也。<sup>137</sup>

在一些例證中，鑒賞與收藏背後的激情與藝術精神，變為忠義節烈的前奏。戴洵記述一六七五年訪冒襄，得睹曾為瞿式耜 (1590-1651) 珍藏的沈周 (1427-1509) 長卷，寫下〈觀白石翁畫卷記〉。瞿式耜一生酷愛沈周畫：「重價購取，寸縑尺帛，寶惜如天球琬琰，招延二三高人，摩娑賞玩，寢食以之者二十年。」<sup>138</sup>收藏漸富以後，揀選最佳的若干幀，請名工裝潢，手自標識，珍藏於耕石齋中<sup>139</sup>。沈

<sup>135</sup> 黃宗羲：《思舊錄》，頁 342-343。

<sup>136</sup> 試舉《聊齋》故事〈鶴異〉為例。張幼量癖好鶴，苦求佳種，愛護無微不至。後有父執輩貴官索鶴，張忍痛割愛，而鶴竟為所烹。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中冊，卷 6，頁 839-843。

<sup>137</sup> 黃宗羲：《思舊錄》，頁 341-342。

<sup>138</sup> 冒襄輯：《同人集》，卷 3，頁 21a-22a。

<sup>139</sup> 參見吳偉業〈後東皋草堂歌〉：「石田書畫數百卷，酷嗜平生手藏錄。」見靳榮藩輯注：《吳詩集覽》，第 3 冊，卷 4 下，頁 14b-16b。

周號石田，石田不能耕，瞿以耕石顏其齋，表示對沈周的心儀與尊崇。沈之號，瞿之齋名，均顯揚藝術創作與鑒賞的「無用之用」。莊子「無用」所代表的精神自由與解放，往往是士人不遇的息肩之所，藝術境界亦藉以開拓。瞿式耜牽連晚明黨禍，獲罪回鄉。盡力收購沈周畫，大概始於休沐里居時。北京陷落，南明弘光帝時復起用，巡撫廣西。南明滅亡後，擁立桂王即位，建立了永曆朝，領導兩廣抗清鬥爭，直至一六五一年兵敗殉國。隨著國難家難，瞿氏收藏散佚：「滄桑以後，留守抗節桂林，公子孝廉伯申以患難破產，至不能保先人之一廬，書畫化為雲烟矣。」<sup>140</sup>

戴洵看到畫卷末還有南明權臣馬士英（1619年進士，1646年死）題識<sup>141</sup>。南明君臣雅好書畫，曾使天才卓異少年殉國的夏完淳（1631-1647）微申怨辭：

上雖喜談褻事，頗親圖繪。一日，貴陽（馬士英）進石田畫一卷，上親署數字，貴陽、孟津（王鐸）共跋一行<sup>142</sup>。若在盛時，丹青遂成佳話，及茲崩潰，飛白竟是清狂。王、馬之不為王、謝也，命矣夫。<sup>143</sup>

夏完淳認為若不是時勢危逼，馬士英、王鐸嗜書畫未嘗不可目為王謝風流，但當時清流諸君子普遍嚴斥南明權臣為奸佞，並認為福王君臣的所謂「風雅」，無異「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sup>144</sup>。戴洵考年月，推斷瞿貽馬畫卷，是為起廢進用。馬士英題識「津津以留守（瞿式耜）割愛為喜」，戴洵認為是弄權協取，並非真賞。瞿式耜力圖匡復，所以不惜關通權倖，並犧牲寶愛的石田畫。「留守愛護石田真蹟，不啻頭目腦髓，奮然割以相贈，知其屢棄一切，毀家致命之志決矣。」畫卷簽紙標題，是瞿式耜手澤，戴洵因為與瞿子有舊，所以能辨認其筆跡。他鄭重地告訴冒襄，殉國熱血掩映筆墨間，沈周畫卷因為曾被瞿式耜題識、珍愛、割捨而彌見寶貴：「毋易此數字，莫弘碧血，猶沾濕隴糜不律間，今當以留守重石田矣。」<sup>145</sup>鑒賞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壯志，暗示藝術價值與道德價

<sup>140</sup> 瞿式耜毀家紓難，瞿子變賣家業東皋草堂，亦見吳詩：「可憐雙戟中丞家，門帖淒涼題賣宅。有子單居持戶難，呼門吏怒索家錢。窮搜廢篋應無計，棄擲城南五尺山。」（同前註，卷4下，頁15a-b）

<sup>141</sup> 鳳陽督撫馬士英因擁立福王晉陞為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sup>142</sup> 馬士英善畫，王鐸則是著名的書法家。

<sup>143</sup> [清]夏完淳著，白堅箋校：《續幸存錄》，《夏完淳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10，頁475。完淳父夏允彝評論馬士英亦比較寬容。

<sup>144</sup> [明]陳子龍：〈恢復有機疏〉，《兵垣奏議》（1897年松江刻本），頁30a。尤為人詬病的是南明宮廷的戲曲活動，阮大鍼與福王對編戲、看戲的熱中，成為國事荒廢的表徵。

<sup>145</sup> 冒襄輯：《同人集》，卷3，頁21b。

值之間的延續。瞿式耜的酷愛石田畫，與他後來抗節桂林壯烈殉國竟成一脈相承。由兒女而英雄，是明末清初常見的命題。此間不過是把談情與談藝等量齊觀，都化為道德勇氣之源了。

## 五、審美空間的轉化

風雅與氣節合流，形成審美空間的轉化，藝術境界遂與政治活動或歷史關懷連結。茲以江南名園為例。祁彪佳(1602-1645)的寓山，是晚明園藝的頂峰<sup>146</sup>。晚明對設想真與幻、夢與覺之間關係的興趣，在祁彪佳的〈寓山注〉表露無遺。祁自述「開園之癡癖」——「極慮窮思，形諸夢寐」，「予亦病而愈，愈而復病」。寓山諸勝，均有取於視覺的轉移變幻，藏高於卑，取遠若近，乍無乍有。「夫夢誠幻矣，然何者是真？吾山之寓，寓於覺，亦寓於夢，能解夢覺者皆寓。」<sup>147</sup>南明福王時，祁彪佳任江南巡撫，一六四五年清兵陷杭州，即於寓山絕粒投池自盡。入清以後，祁子理孫(1627-約1663)、班孫(1632年生)在寓山聯絡抗清志士。有關情事全祖望(1705-1755)在〈祁六公子墓碣銘〉淋漓述說：

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望以為膏梁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為毫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谿娃以荐之。又發淡生堂壬遁劍術之書以示之，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sup>148</sup>

<sup>146</sup> 有關祁彪佳與寓山，可參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收入李豐楙、劉苑如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學與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373-420；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162-188；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anna Handlin Smith,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1.1 (Feb. 1992): 55-81。

<sup>147</sup> [明]祁彪佳：〈寓山注〉，收入周作人編：《明人小品集》（香港：田園書屋，1987年），頁109-110。

<sup>148</sup>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鮚埼亭集》，卷13，《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

夷度先生即祈承燠（1604年進士），祁彪佳父。祁氏三世志行與趣味的傳承與轉移，頗堪玩味。承燠以書癖自許，其諸子似乎稍豪奢，喜結客和講究食饌，祁彪佳更嗜戲曲和亭園。到祁理孫、班孫兄弟，結客已從貴游逸樂變為謀劃恢復，寓山亦成爲談兵說劍的所在。祁氏兄弟爲魏耕（1614-1662）置酒呼妓，則是認定酒色無礙賢豪俠義。據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魏耕曾致書鄭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1659），延平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遮道留張尙書（即張煌言），請入焦湖，以圖再舉，不克。」<sup>149</sup>可見魏耕與鄭、張水師入長江有密切關係。後魏耕於祁家被執，一六六二年殉難杭州。當時株連甚衆，祁班孫亦因之遣戍遼左<sup>150</sup>。其時可能同預通海之謀者，尙有遺民詩人屈大均（1630-1696）。一六六〇年，屈「復返儒服（案前此屈曾削髮爲僧），入越，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者五月。」<sup>151</sup>大概可以繫於此時之詩，瀟漫求仙與逃世的意象。晚明徘徊真幻的興致，於是平添濃厚的政治意味：「相留暫向祇園住，正是中丞（祁彪佳）殉節處。碧水含秋似汨羅，黃金布地同玄度。櫻桃開遍畫欄杆，揮塵鳴琴興未殘。半山每答猿公嘯，千仞將聯鳳鳥翰。鳳鳥高飛何所止？金陵宮闕五雲起。一鳴素水降真人，再鳴留侯遇松子。」<sup>152</sup>屈大均筆下的祁氏藏書，已與嗜古好學無涉，而是展現幻境與寄託政治抱負的想像世界：「長風吹我至禹穴，猿啼虎嘯依藤蘿。秦皇碑愛蟲文古，夏后書愁鳥蹟多……聞君藏得鍊劍圖，時時風雷起座隅，慷慨肯授英雄無……天下戰爭猶未已，請君亦讀孫吳書。」<sup>153</sup>

冒襄的水繪園是另外一個值得考索的例子。從李孝悌的研究，我們得悉水繪園的興衰與遺民世界的關係<sup>154</sup>。先後在園中棲遲的遺民、抗清志士及其子侄，包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上冊，頁257。

<sup>149</sup> 同前註，頁175。紀朱士稚、魏耕事又有朱彝尊：〈貞毅先生墓表〉，《曝書亭集》，第2冊，卷72，頁828。

<sup>150</sup> 其後祁理孫以痛弟鬱鬱而死。一六六五年班孫逃歸，爲僧堯峰。

<sup>151</sup> 朱彝尊著：《靜志居詩話》，轉引自陳田：《明詩紀事》，第5冊，頁3048-3049。參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明清史料彙編》，第7集第9冊），頁44-51。

<sup>152</sup> [清]屈大均：〈客山陰贈二祁子〉，《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冊，頁177。

<sup>153</sup> 屈大均：〈題山陰祁五祁六藏書樓〉，同前註，頁140。

<sup>154</sup> 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頁81-124。

括杜濬、方以智，其子方中德、中通，上文論及的姜實節，湖州反清戰死的戴重之子戴移孝及上文提到的戴本孝等<sup>155</sup>。一六五二年，水繪園歸冒襄父冒起宗，旋即修建為名園<sup>156</sup>。一六五四年，冒襄將水繪園改名水繪庵，並於次年作〈水繪菴約言〉：「一入此中，無所還忌。如界鴻溝，其次辟地。園易為菴，菴歸僧主。我來是客，靜聽鐘鼓。」<sup>157</sup>據陳維崧〈水繪庵記〉：「冒襄以遭值不偶，乃解脫絃組，將與黃冠緇侶遊。」<sup>158</sup>當時題詠均讚嘆冒襄的脫略，鄧漢儀(1617-1689)就曾寫道：「儼成高士宅，半作老僧居」<sup>159</sup>。韜晦大概是為了自保——清廷對江浙士人的鎮壓和打擊，不數年即釀成科場案(1657)、奏銷案(1661)、通海案(1661)、明史案(1661-1663)等大獄。《影梅庵憶語》曾記「丁亥(1647)，讒口鑱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sup>160</sup>，暗示順治年間冒襄曾涉嫌參予或協助復明活動，但實際詳情已不易確知。佛道離塵出世的姿態，無礙對情的執著。誠如杜濬題詠水繪庵之句：「十年幽泛幾沉吟，聞道為園今更深。碧落方求人外友，青天寧負夜來心。」<sup>161</sup>碧落廬是冒襄為亡友戴重而建，「夜來心」句指對董小宛的懷念。雖然碧落廬有「一僧听夕」<sup>162</sup>，但似乎只是為了鐘磬聲的點綴。冒襄惜逝，因造園而沉吟更深。

冒襄在水繪園延客結社唱和，時人比之信陵君<sup>163</sup>。水繪園盛時招致無虛日，自東林幾社、復社諸舊交及其子弟，清廷新貴，以至隱逸縉羽之倫（包括逃禪披緇的遺民），「來未嘗不留，留未嘗輒去，去亦未嘗不復來。而聞風向慕者，則

<sup>155</sup> 關於戴重，參陳田：《明詩紀事》，第5冊，頁3006-3009。其子亦能詩，參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第2冊，頁688-694。戴移孝的《碧落後人詩》，牽連乾隆文字獄，其後人因之慘遭殺戮。水繪園有碧落廬，乃冒襄為紀念戴重而建，戴移孝、戴本孝曾館於其中。〔清〕戴本孝：〈小三吾倡和詩序〉，收入冒襄輯：《同人集》，卷1，頁30a-31b。陳維崧：〈水繪庵記〉，收入同上書，卷3，頁2b-4b。

<sup>156</sup> 王利民、丁富生、顧啓：《冒辟疆與董小宛》，頁149-157。

<sup>157</sup> 冒襄：《巢民文集》，卷5，頁9b-10b。

<sup>158</sup> 陳維崧：〈水繪庵記〉，卷3，頁2b。

<sup>159</sup> 〔清〕鄧漢儀：〈庚子冬日過水繪庵次其年原韻〉，收入同前註，卷6，頁63b。

<sup>160</sup> 冒襄：《影梅庵憶語》，頁154。

<sup>161</sup> 冒襄輯：《同人集》，卷6，頁1b。

<sup>162</sup> 陳維崧：〈水繪庵記〉，卷3，頁4a。

<sup>163</sup> 〔清〕余啓美〈冬至前五日小集同社諸子飲其年於辟翁齋中〉：「賴有信陵能好客，風流今日說邗江。」見同前註，卷6，頁43a。

又神交色動矣。」<sup>164</sup>這對清廷有關立盟結社的禁令，能否算是間接的反抗<sup>165</sup>？社集諸詩文卷帙浩繁，頗難概括泛論，但可以斷言眷懷故國哀悼風流雲散為基調之一——在水繪園淹留八載之久的陳維崧，寫下很多這類篇章：「扁舟直壓大江寒，握手孤城仔細看。信有青袍能跋扈，却憑紅燭照艱難。霜枯狡兔誰能逐，秋老鱸魚我正餐。萬事只憐頭上月，故宮玉樹總凋殘。」<sup>166</sup>「當年燈火隔江繁，回首南朝合斷魂。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尊。亂餘城郭雕龍散，愁裏江山戰馬屯。今日淒涼依父執，烏衣子弟幾家存。」<sup>166</sup>飛揚跋扈，磊落不平，只能藉紅燭高燒映照世路艱難。結客開尊，聊遣故宮禾黍之悲。水繪園是亂餘蕭殺劫後相依的境域：「我向此間聊躑躅，乾坤聞道尚橫戈。」<sup>167</sup>

酬唱篇什中亦有隱喻圖謀恢復之壯志者，如「此日親風雅，多年厭鼓鞮。聞雞誰起舞，如意與提攜」，「翊漢懷諸葛，椎秦憶子房」<sup>168</sup>，也有置復明的慷慨悲歌於讌集華辭，表示後者的無可奈何：「舞袖歌喉向月寒，那堪正值亂離看。身從吳市吹簫慣，夢去燕都和筑難。蘭露成漿須痛飲，松霞作饌勸加餐。會逢千里同心樂，北斗闌干曲未殘」，「醉天灰劫日翻奇，元結唐亭晏臥宜，壯志可容龍劍老，新愁只許杜鵑知。八公草木今何似，三戶菰蘆某在斯。忽望高樓空百尺，茫茫湖海動余思。」<sup>169</sup>更有寓家國之思於狎興留連者——順治及康熙初年冒氏家樂班有楊枝、秦簫、紫雲等能度曲演劇的歌僮，有關他們的題詠連篇累牘，屢見《同人集》及清初詩文集，陳維崧與紫雲生死纏綿的戀情更爲人所熟知<sup>170</sup>，

<sup>164</sup> [清] 盧香：〈冒巢民先生傳〉，同前註，卷首，頁 1a-2a。

<sup>165</sup> 一六五一年條議學政六事之一爲禁止生員結社。《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 年影印《清實錄》，第 3 冊），卷 55，頁 7b-8a。一六六〇年禮科右給事中楊雍建上疏，力主嚴禁結社訂盟，更特別針對「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見同上書，卷 131，頁 12a。

<sup>166</sup> 陳維崧：〈戊戌(1656)冬日過雒陽訪冒巢民老伯讌集得全堂同人沓至出歌僮演劇即席限韻四首〉其一、其二，收入冒襄輯：《同人集》，卷 6，頁 41b-42a。陳維崧父陳貞慧與冒襄、侯方域、吳應箕在明季合稱四公子。

<sup>167</sup> 陳維崧：〈戊戌冬日過雒陽訪冒巢民老伯讌集得全堂同人沓至出歌僮演劇即席限韻四首〉其四，見同前註，卷 6，頁 42a。

<sup>168</sup> [清] 石寶臣：〈遷于諸君集辟疆齋頭邀陪其年即席限韻〉，同前註，卷 6，頁 43b-44a。

<sup>169</sup> [清] 瞿有仲：〈得全堂讌集次巢翁先生原韻〉其一、其三，同前註，卷 6，頁 54b。

<sup>170</sup> 冒廣生：《雲郎小史》，收入張江裁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北平：松筠閣書店，1937 年），第 1 冊；Sophie Volpp, "The Literary Circulation of Acto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3 (2002): 949-984；房學惠：〈簡析紫雲出浴圖卷〉，《東南文化》2006 年第 1 期，頁 91-96。

題贈篇章固多風流婉媚之作，然亦有從歌僮絕藝聯想到滄桑巨變，如陳維崧的〈秦簫曲〉：「此間秦簫曲中傑，忽然高唱受降城，砵作水車鐵馬聲。須臾如抗復如墜，老馬郭索沙場行……二十年來事可憐，化作迷樓樓下土。」又如他的〈徐郎曲〉，糾合艷情與史識：「二十年來事沾臆，南園北館生荊棘。崔九堂前只獨憐，奉誠園內無相識。琵琶斜抱恰當胸，細說關山恨幾重……暗裡漫尋前度曲，人前不認舊時容。誰知老大不自得，却向徐郎敘疇昔。疇昔烟花不可親，徐郎一曲好橫陳。干卿何事馮延巳，錯譜悲涼感路人。」<sup>171</sup>即便是演劇、觀劇，也可賦予特殊的歷史意義。自稱明亡以後「倦觀歌舞」的陳瑚，於一六六〇年在得全堂觀看《燕子箋》與《邯鄲記》時，借舞臺上的異代衣冠致慨：「無端愁殺江南客，袍笏威儀見漢官。」<sup>172</sup>水繪園的審美空間，透過江左風流的延續而與離亂的時代抗衡。文酒聲色是否可以「自贖」，頗可爭議。無可置疑的是描繪聲色的辭彙通過隱約和寄託，包羅更廣，取義更深。

## 六、小結

清初對晚明文化的批判，較著者有顧炎武(1613-1682)論「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顧認爲明朝自嘉靖以來，因過重文章而華而不實，尤爲深惡痛絕的是悅人欺人的「巧言」<sup>173</sup>。顧炎武又以晚明虛談心性比附魏晉清談，並嚴斥後者「亡天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sup>174</sup>巧言與清談，使人聯想到浮靡誇飾、任性縱情的士風。從反面看，聲華玩物代表耽溺、瑣細與荒嬉。但據本文初

<sup>171</sup> 陳維崧：〈秦簫曲〉、〈徐郎曲〉、〈楊枝曲〉，收入冒襄輯：《同人集》，卷6，頁47b-49b。

<sup>172</sup> 陳瑚：〈得全堂夜讌記〉、〈得全堂夜讌後記〉，收入同前註，卷3，頁5a-8b；〈和有仲觀劇斷句十首〉其三，收入同上書，卷6，頁55a。參看李光生〈觀劇〉詩類似的感慨：「堪羨梨園歌舞儔，衣冠楚楚舊風流」，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卷2，頁167。

<sup>173</sup>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19，頁450-451。

<sup>174</sup> 同前註，卷13，頁307。

步的探索，清初對晚明文化的反思，並不見得強調玩物喪志的弊端。有些作品，如張潮的《幽夢影》，刻意追蹤明季的閒賞藝術。別的如李漁(1610-1680)的《閒情偶寄》(1671年序)，擺脫了明末談物譜錄的刻板 and 性情文字的執著與恣意，以輕鬆、踏實、圓融的筆墨調和矛盾，肯定享樂，建立權威與典範。

《閒情偶寄》沒有什麼政治意味可言。相反地，本文探討前朝遺物，把牽涉鑒賞與收藏的語境聯繫到進退出處的抉擇與文人集團的界定。換言之，明季談物的趣味在清初轉向「政治化」。物通過與個人記憶、歷史反思、文化傳承的關係而具備一種「救贖性」。雖然清初遺民多有悔罪心理，但懺悔的框架並非都能貫徹始終。即如張岱(1597-1679)的《陶庵夢憶》(1671年序)，序言申明悔意——作者自云把過往一切「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但夢憶的主調是留連光景，追懷明季冶遊，牽念奇人異物。書中有揭露繁華背後的陰暗面(如〈揚州瘦馬〉、〈二十四橋風月〉)，亦有點出積聚收藏的徒勞(如〈三世藏書〉)和奢華靡費的報應(如〈西湖香市〉、〈越俗掃墓〉)，但這些例證不足以抗衡瀰漫全書撫今追昔的悲懷。張岱曾在《西湖夢尋》序言說亂後的西湖萬萬比不上他夢中的西湖——失落的故國既然只能在夢境、回憶與文字中追尋，執著也由偏至之情提升為不渝之志了。本文論述風雅與氣節的關係及審美空間的轉化，歸結到道德境界與藝術境界的交融、平衡與張力。唯美、尚情、享樂是否使人降志辱身，並動搖國家社會秩序？我們徵引的例子，操持相反的論調——物情、物理的感悟、聲色玩好的追求和書寫，讓人面對往昔，理解歷史，通過藝術境界調解矛盾與超越困境。「蠟亦不肯灰，歌亦不肯絕」<sup>175</sup>，成爲一種與時代對話的生活方式。

<sup>175</sup> 陳維崧：〈秦簫曲〉，卷6，頁47b。

# 世變與玩物

## ——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尚

李惠儀

本文擬探討晚明談物的論述在清初的轉化。文人通過玩物、體物、觀物之「自我建構」，在易代之際融入興亡之感與歷史記憶，是以第一節先從前朝遺物談起。在清初的政治氛圍，談物實界定一種文化空間，呈現其社會效用。這是遺民相濡以沫之情懷，亦往往是遺民與清臣交往的線索之一，而明清之際士人進退出處的抉擇，又經常可從其談物賞鑒品第的語彙中察見端倪，所以第二節論及玩物在不同的文人集團所衍生的多層聯繫。玩物的政治寓意可濃可淡，「風流遺民」在文酒社集中托物寄興，是別有深心的鬱勃憤懣，還是「雖不得志，亦且快意」的放浪？此又牽涉清初對明末文人文化任性恣情的反思。第三、第四節所討論的，便是風雅與氣節的關係，藝術境界與道德境界的相反相成。

關鍵詞：玩物 前朝遺物 歷史記憶 風流遺民 風雅 氣節

## Radical Change and Connoisseurship—A Discussion of Early Qing Aesthetic Style

LI Wai-yee

How the early Qing continued and transformed the late Ming discourse on collecting and connoisseurship provides interest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y Qing evaluation of, and nostalgia for, late Ming culture. “Objects from the fallen dynasty” became a venue for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flection. They derive their value from the history they embody, the lives of their owners, and (or) their intrinsic aesthetic attributes. Their social functions allow us to assess the self-definition of loyalist communities as well as the literary-social ties between loyalists and those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the new order. The varying political meanings of the “discourse of things” encompass a range of emotions, from vague nostalgia to a strong sense of alienation. Of special interest is the group of “romantic loyalists” who affirm the continuum between loyalist sentiments and romantic-aesthetic sensibility. They define themselves as “remnants” not only of the fallen Ming but also of late Ming culture, with all its valorization of refinement and intense emotions. By this logic, aesthetic communion over historical objects and cultural artifacts is a mode of loyalist lament. In conclusion, we thus consider the balance and tension between aesthetic sensi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in early Qing historical memory and judgment of the fallen Ming.

**Keywords:** the discourse on things    connoisseurship    historical memory  
romantic loyalists    aesthetic sensibility    political integrity

## 徵引書目

-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
-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 毛奇齡：《西河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孔尚任著，王季思等註：《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_\_\_\_\_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王汎森：〈清初人士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爲——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年。
- 王利民、丁富生、顧啓：《冒辟疆與董小宛》，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方拱乾：《甦庵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集部》第7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
- 《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朱熹：《四書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90年。
- 朱彝尊：《曝書亭集》，上海：世界書局，1937年。
- 牟復禮、崔維澤編撰，張書生等譯，謝亮生校：《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全祖望撰，朱鑄禹校注：《鮑琦亭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吳偉業著，靳榮藩註：《吳詩集覽》，收入《四部備要》，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_\_\_\_\_，吳翌鳳箋疏：《吳梅村詩集箋疏》，香港：廣智書局，出版年不詳。
- \_\_\_\_\_，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吳雯：《蓮洋詩鈔》，收入《四部備要》，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吳綺：《林蕙堂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吳嘉紀著，楊積慶箋校：《吳嘉紀詩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收入《明清史料彙編》第7集第9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 汪琬：《堯峰文鈔》，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杜甫著，仇兆鰲註：《杜詩詳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 杜濬：《變雅堂遺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宋琬：《宋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
- 宋犛：《西陂類稿》，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冷士嘯：《江冷閣詩集》，《江冷閣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_\_\_\_\_：《江冷閣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余懷：《余澹心集》，《余懷集》，收入《福建叢書》第3輯，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
-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房學惠：〈簡析紫雲出浴圖卷〉，《東南文化》2006年第1期，頁91-96。
- 周作人編：《明人小品集》，香港：田園書屋，1987年。
-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邵忠、李瑾編著：《吳中名賢傳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胡紹棠選注：《陳眉公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
- 姜埰：《敬亭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冒廣生：《雲郎小史》，《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第1冊，北平：松筠閣書店，1937年。
- \_\_\_\_\_：《冒巢民先生年譜》，收入《如皋冒氏叢書》，清光緒戊申年。
- 冒襄：《巢民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_\_\_\_\_：《巢民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_\_\_\_\_編著：《同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8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_\_\_\_\_：《影梅庵憶語》，收入吳定中編著：《董小宛滙考》，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
- 施閏章著，吳家駒點校：《施閏章詩集》，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 施蟄存編選：《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
- 徐元誥撰，王樹民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徐崧、張大純纂輯，薛正興校點：《百城烟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徐蕭：《小腆紀傳》，收入《台灣文獻叢刊》第13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孫承澤：《硯山齋雜記》，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_\_\_\_\_：《庚子銷夏記》，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夏完淳著，白堅校釋：《續幸存錄》，《夏完淳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張潮、楊復古、沈懋德等編纂：《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陳子龍：《兵垣奏議》，松江刻本，1897年。
- 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陳維崧：《陳檢討四六》，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_\_\_\_\_：《湖海樓詞集》，收入錢仲聯編，陳銘校點：《清八大名家詞集》，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
-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香港：中華書局，1958年。
- 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收入李豐楙、劉苑如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 陸應暘編輯：《樵史通俗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
- 黃中堅：《蓄齋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 黃宗羲：《思舊錄》，收入《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彭年：《隆池山樵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熊禮匯選注：《袁中郎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
- 《漢武故事》，收入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
- 鄭玄註：《易緯是謀類》，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
- 錢駟：《甲申傳信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錢澄之：《藏山閣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
- 錢穆：《莊子纂箋》，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1957年。
- 錢謙益著，錢曾箋註，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_\_\_\_\_：〈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山東萊陽姜氏行誼考論〉，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
- 魏禧：《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蕭統：《昭明文選附攷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 蘇軾撰，王十朋集註：《東坡詩集註》，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
-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 \_\_\_\_\_，王冀民箋校：《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大木康：〈宣爐因緣——方拱乾と冒襄〉，《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5集，2003年10月，頁166-180。
- Barr, H. Allan. "Novelty,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in Zhang Chao's *Yu Chu xinzhì*."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d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 Clunas, Craig.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_\_\_\_\_.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 Handlin-Smith, Joanna.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1.1 (Feb. 1992): 55-81.
- Li, Wai-ye (李惠儀). "The Collector, the Connoisseur, and Late-Ming Sensibility." *T'oung Pao* 通報, Vol. LXXXI (1995): 269-302.
- \_\_\_\_\_. "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d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_\_\_\_\_. "Introduction: Existential, Literary, and Interpretive Choices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d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Mote, Frederick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truve, Lynn A.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8.

Volpp, Sophie. "The Literary Circulation of Acto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3 (2002): 949-984.